



# 對話與書寫之我的日本語與漢人意識

My Japanese Language and Han Identity  
in Dialogues and Writings

指導教師：古川ちかし

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陳思懿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

July, 2010

碩士論文題目：

日文：『対話と書き物を通して表れた私の日本語と漢人意識』

中文：『對話與書寫之我的日本語與漢人意識』

英文：『 My Japanese language and Han Identity in Dialogues and Writings 』

研究生：陳思懿

指導教授：江崎了也 (簽章)

審查教授：林珠雪 (簽章)

成如鼎 (簽章)

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

99年6月24日

# 對話與書寫之我的日本語與漢人意識

## 摘要

這是一個在台灣的「日語學習者／漢人」所述說的，有關於她自己的故事。

從最初的正式學習至今，接觸日語已經 14 年了。然而，她終究沒有成爲一位「精通日語的達人／台灣人」。或許她該感到慚愧，慚愧自己浪費了父母的心血、浪費了社會資源。身爲一位日語相關科系畢業的學生，不趕緊加強自己的日語能力以儲備往後就職的競爭力，竟然現在還「理直氣壯」的說自己日語不好沒有什麼不對。

就在她向前追尋「日本語」數十年之後，因爲一個契機，四年前她開始轉過頭來，看見台灣在地的原住民族他們當今的社會處境。只是在這向前／向後間，她突然困惑起自己的處境位置的微妙，加上「學術」「研究」的光環／枷鎖，她更是迷惘在自己的身份與立場的來去轉換之間。

於是在困惑中，她找到了「自我敘說＝說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方式，並試著用這樣的方式對社會、對主流、對體制發出自己的聲音，期待有所回音也期待這樣的過程可以幫助她解開困惑；同時她也在進行一種自我實踐，如同進行實驗般，身體力行去做了一場名爲「論文可否是故事」的賭注性實驗。縱使這樣的實驗已有不少人證實結果是肯定的，然而屬於她的實驗，卻才剛起步而已。

起初她想用自己所會的日本語來發聲，後來發現自己終舊無法脫離中文的思考模式，進而轉以「翻譯」中文的草稿藍圖成爲日本語的方式來呈現。然而在翻譯的過程中，她卻又發現，原來自己也有以日語爲主的思考模式，中日兩種語言對她而言，是兩種方向、兩種思考脈絡，所以同時收錄兩種語言版本的目的並非爲了展現她的語言能力，而是爲了展現屬於她的兩種語言所陳述出的兩種觀看她的生命故事的方向與角度。

故事的另外一個重點即是她的「漢人意識」。何謂「漢人意識」？她並無法準確描繪，她只知道面對與觀看台灣原住民時，她的「漢人」身份不斷被提醒，「漢人意識」如影隨形般依附在她的思考脈絡中，但在本文的字裡行間卻難以具

體標示出何處為漢人意識、何處無漢人意識。台灣原住民族映照出她的「漢人意識」，也翻轉了她以往對於「漢人」的認知框架。

「說自己的生命故事」的意義在於透過對自我的觀看與再現，進而達到和他人交流只屬於個人獨一無二的生命經驗為目的。在本文中，「故事」不是關起門記錄下來只供自己觀賞、閱讀與憑弔的私密性日記（也有所謂以和他人交流為目的地的「交換日記」，但交流對象仍舊只限於特定範圍以內），而是以未知的大眾為對象所公開的一種「聲音」。

故事前期她如同落海者般，載浮載沈於思緒奔騰又澎湃的腦海中，一直在尋找能夠攀附的救生圈。她以為找不到了，然而就在她即將滅頂時，好幾個救生圈飄近過來。因此到故事後期，她希望有朝一日自己的故事也能夠成為其他落海者載浮載沈時所抓住的救生圈之一，使落海者不致隨波逐流或被海浪所吞沒。

關鍵字：生命故事、自我敘說、日語學習者、漢人、自我認同、自我意識、自我實踐

## 目 次

● 關於「題目」.....	1
● 記憶——把過去連結到現在.....	2
● 我說.....	4
● 爲了什麼而說？.....	8
一、轉向再轉向……最終，找到目的地了嗎？.....	10
二、爲什麼是日語？.....	13
三、「論文」是有個性的——作爲一種抗拒主流的方式.....	21
四、理論的角色——它的表演位置在哪？.....	23
● 有所寫，有所不寫.....	24
● 我的系所課程沒有「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從文獻當中學習.....	26
● 說自己的人生／故事：我的研究方法.....	29
● 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在研究所的日子.....	31
一、從門外走進門內.....	31
二、不一樣的「日研所」.....	33
(一)其實不是日研所——多元文化交流研究所.....	33
(二)我和「老師」的距離.....	36
(三)我的海外交流小史：韓國·日本·菲律賓.....	38
1. 韓國經驗.....	38
2. 日本·沖繩經驗.....	39
3. 菲律賓經驗.....	42
(四)我的原住民部落交流小史：史努櫻·中原.....	44
1. 史努櫻經驗.....	44
2. 中原經驗.....	44
(五)小結.....	46
● 爲什麼是「原住民」？.....	47
● 從「山」活動計劃開始.....	52
一、她說我是「平地人」——我說：我是誰？.....	52
二、我所習得的——用以評判「原住民」——價值觀.....	55
(一)教科書：官方塑造之價值觀.....	55
(二)媒體：社會價值觀之縮影寫照.....	57
三、研究生的身份.....	59
(一)是「研究」？還是關係的建立與維繫？.....	60
(二)是學術？還是利用？.....	62

## 目 次

● 她的故事——我們的對話：第一次寫別人，其實很不安.....	64
● 然後.....	70
● 寫在「然後」之後.....	72
主要參考資料.....	日文版 76
附錄資料.....	日文版 80
後記	

● 關於「題目」<sup>1</sup>

相同的題目再寫一遍，我肯定自己絕對寫不出如下那般的內容。又或者該說，「題目」從來沒有成為我寫作本文的中心思想，甚至我覺得打從一開始就訂定題目這件事是一種對「書寫<sup>2</sup>」的「限制」。不過可笑的是，從構思本文開始我也曾經假設了幾個題目去著手準備相關文獻，但到後來在寫作這個”版本”時，之前的文獻卻幾乎沒有幾個是用得上的，可我卻也無法斷定那些收集的文獻對我來說沒有任何的幫助，應該說那些文獻幫助我更明確的知道我想要的並不是它們，而是其他我還沒有找到但又莫名確信肯定存在的文獻資料，並且使我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換題目。

雖說這個”版本”的題目如上，但坦白說其實是行文到超過全文二分之一時，我才發覺：「啊！『這個（指”對話與書寫之我的日本語與漢人意識”）』應該就是我的題目了吧？！」好像突然打通全身經絡般，我找到了對我而言能夠「具體表達的文字」來形容腦子裡沉浮已久、來回衝撞又混沌不清的「構想／概念／感受」。

「日本語」與「漢人意識」並非是互相對應／比較的兩造（例如：不是「日本語」VS「漢人意識」的意思），更不是同時對應／比較於另一個對象（例如：不是「日本語」&「漢人意識」VS「○×△」的意思），而是它們有它們各自對應／比較的多重對象。

寫到這裡，我很想問讀者：看到題目和看到這裡，你各別想到了什麼？

---

<sup>1</sup> 本文以不同字體來區分／標示新舊文之間的前後時間關係。新細明體（例如：現在所使用的字體）代表初次寫下的文章，標楷體（例如：此種字體為標楷體）則代表重讀初稿之後所寫下的新文，目次、摘要、註腳、參考文獻等其他方面則不作此一區分。另，依據寫作的實際情況，新舊文之間的寫作時間間隔難以提出具體確切的說明。

<sup>2</sup> 不過這還得視我對「書寫」的定義為何才能再深入作討論何為「限制」。詳見本文第 7, 8, 9 頁。



## ● 記憶——把過去連結到現在

小時候買了一本專門用來收集信封信紙的本子上面寫著一句話：「記憶就像一條河……」，以前對於這句話未曾懷疑，覺得記憶會流動，會隨著水流越來越遠……。直到去年爲了本文收集資料與採訪而回到老家時，坐在書桌前不經意抬起頭看見本子，才琢磨起這句話的含意。記憶其實不像一條河，它並非如流水般不停的往前奔去，它會離我們愈來愈遠，但不一定一去不復返，反而比較像是零散不一的拼圖存在腦子裡，只是有時候一塊一塊分散的拼圖容易找到，然後拼得出一些人事物的大致輪廓，但有時候卻永遠找不到，甚至根本就“完全遺忘”那些拼圖存在一事，更可能有時候爲了某些因素而拿了不相穩合的圖塊來硬塞、來含混充數。

自傳式寫作非常需要的條件之一就是良好的記憶力，另外還必須不斷藉助昔時所寫的日記、照片或收集的物品、訪問親朋好友來加以輔助，過程就像是在拼圖一樣，相關連的人事物接連不斷的浮現，可能最後可以完整浮現，也可能到達一個境界時，怎麼想也不再有任何畫面浮現；隔了一段時間，因爲受到某些人事物的觸發而再度延續與填補先前的空缺斷裂…。將浮現的記憶經過處理（按照時間的序列或是寫作意義的連結安排），才會變成自己以外的他人也能看得懂的自傳式文章。只是這樣的「處理」本身其實有違人類生命的常理，並且這樣的「處理」常教人誤以爲自傳的內容即等於生命本身<sup>3</sup>，以爲生命本身就如同自傳的內容所陳述的那般井然有序、簡潔易懂而忘卻生命本身的「繁瑣（許多人事物毫無秩序的混雜滲入）」與「斷裂的接續（A 事件還沒結束卻因 B 事件的發生而被迫中斷，然後不知在何時 A 事件又開始繼續進行）」之性質。不過上述性質若要透過文字書寫來如實呈現並非易事，礙於書寫技術的不純熟與現實狀況的考量（畢業時序的近逼），本文仍將參照普遍的自傳式寫作方式，透過對記憶的追溯、時間的序列以及意義連結上的安排來呈現與記錄自己的生命軌跡。只是「記憶」不是全然可靠的，也不全然是寫實的（何謂寫實、何謂不寫實的問題暫且另當別論）。人類受限於腦部的生理構造與功能，對於某些事情的記憶可能完全喪失或是只記得部份（「記得」本身可能就是捏造／被捏造的，又或者「記得的事物」本身可能也是捏造／被捏造的）而非全面的、非還元現場的，故本文一開始便藉由提出對於「自傳」與「記憶」的一些質疑與想法，邀請讀者接下來閱讀本文時

<sup>3</sup> 根據鄭玉卿教授整理發表 Pierre Bourdieu 對於個人的自傳一個著名的說辭—「自傳幻覺（The biographical illusion）」之論述的簡介與評論提到：「Bourdieu 認爲生活史的書寫，是基於將生活視爲全面、一致的、一個前後一貫有條理的整體，必須被看成是一個有主觀和客觀的個體表現。……傳記通常也會從童年開始追溯，至青年、到老死，朝向一個有意義、有目標的直線發展，以一種具有邏輯秩序的方式，自以爲是地將生活事件之間可理解的關係加以連結，並加以賦予特別的意義，以彰顯其存在的價值，獲得偉大的啓示。但若就生活是反歷史的、獨一無二且自足的連續事件而言，這種以依據年代順序組織成傳記，其實是脫離事實的臆測，是一種歷史的幻覺。……」

能繼續思考：依賴「記憶」所寫下的「自傳」其內容「真假<sup>4</sup>」的問題。

話說一般平凡人有誰能夠記得所有發生過的事情與其經過和細節呢？而且，「所有」的定義為何又因人而異，因此我認為關於「記憶」、關於「過去」的拼圖應是沒有完整無缺的可能，只是大部份的人慣於將拼圖裱框的作法除了是在尋求一種安定感，並藉以遺忘或中止繼續尋找其他散落拼圖的苦悶與懊悔，亦是截斷拼圖復原或圖樣變更的可能性，將拼圖框限固定，直到外力的猛烈衝撞足以撼動框架為止（可能是很偶然的觸發所引起，例如巧遇舊識或者看電視、聽廣播、閱讀等等日常行為的進行之間，缺失的拼圖從言談、閱聽的夾縫當中抖落而出）。

此外，記憶之中有些是關乎親身經驗，有些則是藉由「閱聽」所得來的他人經驗。大眾媒體出現之前，憑藉著人際的口耳相傳獲取他人經驗是稀鬆平常，但速度和範圍總不若大眾媒體般快速廣泛，尤其電視媒體，每日傳播眾多消息事件、甚至遠在千里之外的人事物也都是稀鬆平常。如此看來，記憶不只是「個人的」，很多時候其實記憶是「共有的」，特別是那些發生在我們眼界所不及的遠方以及我們來不及參與的過去的事件，透過某些少數的、特定的他者轉述，我們逐漸對未曾經驗的事件產生的「認知」有所記憶——或說我們在某時某地開始「共同擁有」關於某些未曾經驗的事件的記憶。例如透過電視報導，我們普遍都知道 911 事件與南亞大海嘯的「大略」事發經過；透過學校教育，我們普遍都知道 20 世紀曾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因此「自傳」所牽扯的不僅只是「個人的記憶」，同時也包含了和複數個人「共有的記憶」，既隱私又普及。再者除了是「自傳」之外，本文更是一篇「論文」，一篇根據系所老師的說法應該對社會有所「貢獻」才是它最終被產出的意義的「論文」。因此我不得不陷入多重思考：以「我」為主體的本文到底能帶來什麼「貢獻」？為何我選擇在「論文」的面向上作了這樣的寫作方式？到底何謂「自傳」？為何要「公開」「私領域」？又什麼是「公開的」、什麼是「沒公開的」？相對於名人偉人傳記，一般市民小井（例如：我）的「自傳」對此社會又有何影響？

---

<sup>4</sup> 「真假」在此有兩種含意，一為「真實」發生過，另一為透過文字所還元的事發現場其還元度高低。此外，我所寫下的只是書寫當下的我依據對過往的記憶與過往的日記及照片於現階段所記得想起的，並不代表我能夠百分之百的還元事件現場，也沒有人有把握能夠絕對還元。而有關隱私方面的部份也被理所當然的隱藏起來。

## ● 我說

參加研究所入學考試之前，沒有特別準備什麼，反而一個勁兒的猛玩。雖然跟本系第一屆招生考試方式與科目讓人無從準備起的莫名奇妙有著很大的關係，不過我承認那時的我確實愛玩。筆試結束隔天就飛去歐洲玩了三個星期，口試結束隔天就二度飛往東南亞參加同事的婚禮，玩了四天三夜。那時我覺得，準備旅遊計劃比入學考試還要重要，而且確實也是訂好機票以後才知道考試的日期，總之，那時還嫌入學考試麻煩，爲了參加還得改機票與飯店的日期跟行程而差一點就要放棄。後來秉著報名費繳了就不要浪費的節省心態，儘管滿腹怨言，我仍舊準時赴考。

筆試當天爲了兩個科目，幾乎在考場裡頭坐滿了 10 個小時。科目名稱忘了，只知道考試方式很特別：兩個主題各兩篇總共四篇厚厚的日文文章，必須從兩者之中選擇一個主題，在看完兩篇文章之後寫出自己的看法，若是先用中文<sup>5</sup>作答者，之後必須將其內容翻譯成日文，反之亦然。爲了類似日文作文寫作的兩個科目，我坐在考場一整天，午餐還得自備帶入考場食用。小小的一張桌子，放了四篇 A4 大小厚厚的文章跟幾張題目紙及答案紙，加上允許攜帶入場的字典，整個桌面已經被鋪滿了，然後還要在那張桌子上面閱讀作答跟吃飯，擁擠的程度真叫人抓狂。本來就已經覺得很麻煩了，沒想到考試方式更是麻煩，中途實在受不了，差點被這張擁擠的桌子給逼瘋，好在稍作休息之後情緒有緩和下來。兩個主題各自瀏覽了幾遍，後來選了大概看得懂的主題（另一個主題的文章是怎麼讀都不懂內容到底在說些什麼），便沒頭沒腦的開始先用日文寫出自己的想法。終於熬到交卷之後，我仍然怨言滿腹的碎碎叨唸，直到回到家開始整理隔天的行李時，才整個忘記這個筆試有多麼的讓人厭煩。

痛快的在歐洲玩了三個星期，首次遊覽嚮往的歐洲（特別是英國），完全忘記曾經參加考試這件事。回國後收到通知單，拆信之前以爲理所當然的應該是槓龜了，畢竟寫的有點隨便，而且筆試時一顆心早就已經飛到歐洲去了，哪有可能會進入複試咧？而且複試是最討厭的口試，沒過第一階段倒覺得剛好。不過，人生就是這麼的莫名奇妙，筆試方式莫名奇妙就算了，連我能夠進入複試也如此的莫名奇妙，加上連同報名資料一同上繳的報考理由書<sup>6</sup>根本就是亂寫一通，進入複試一事讓我莫名恐慌。

---

<sup>5</sup> 「中文」意指所謂的「國語」，亦即民國 38 年國民政府遷台後所推行的國語運動政策之「國語」之意，意即所謂「漢語」。而「中文」的說法在台灣很普遍，屬於口語白話的說法，並且也是筆者的慣用說法。

<sup>6</sup> 爲報考研究所時繳交的審查資料之一，詳細格式請參照附錄二。

記得五專決定以推甄的方式來升學時，我填寫的第一志願學校就是以「沒有口試」的學校為目標——只要沒有口試的學校就是我的第一志願。放眼望去，當時開放推甄名額的二技當中不需要口試的學校，就只有國立台中技術學院了。如願錄取之後的隔年，升上二技二年級的我決定轉考大眾傳播相關系所。2003年報考的文化大學新聞研究所讓所有考生都必須進行面試，也就是第一階段筆試之後馬上進行第二階段的面試。雖然實際面試時只有短短的五分鐘，然而那短短的五分鐘卻讓我打從報名之後就惦記著直到面試結束。之後的求職面試也令我緊張萬分，但因為心中對於工作就職一事覺得無可奈何，為了生活賺錢倒也能夠心甘情願的坦然接受。只是沒想到在2006年又給自己找了個新的麻煩，可以這麼說吧，當時拆信之後的心情是：進入複試的開心興奮遠遠比不上我在內心咒罵自己多事的捶胸頓足。

硬著頭皮還是上場瞎謊了一堆。面試總共分成三個考場，每位考生都要輪流進入三個考場。我在其中一個考場裡，簡直是語無倫次到達了極點。三位老師其中一位發問：「進入研究所想要進行什麼研究？」聽到問題的我腦筋一片空白，雖然聽得懂老師在問什麼，但卻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因為我單純只是對本系網頁上張貼的課程內容感興趣而已，出現在口試考場上並不代表我想作研究，再者「感興趣」跟「作研究」是兩碼子事，那時的我怎麼會知道想要做什麼研究呢？不過既然上場了，還是硬擠出一些好像有這麼一回事的話來。我回答說：「想將系上三個領域（語言接觸、表象文化交流、社會溝通）做結合來進行研究。」說完這句話的我，殊不知自己扯了一個很難圓的謊。接著老師再問：「那請妳舉出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說明。」天啊，我哪知道有什麼具體的例子可以說明？瞎扯的結果就是繼續瞎扯，雖然我不敢正視三位老師，但我還是瞥見三位老師的表情浮上了許多問號。最終在「時間限制」的解救下，胡言亂語得以倉促的劃下句點。結束面試之後，我整個人幾乎虛脫無力。扯謊的代價讓我對自己感到相當懊惱，對自己的沒自信又一股腦的從內心底層騰升上來。所幸隔天又要出國，忙於整理行李的我又暫時忘卻內心翻攪不已的不安。

第二次前往東南亞泰國，由於當地季節天候的關係，五月的白天躁熱不已，晚上回到飯店早就精疲力盡而顯得有些精神渙散。某天回到飯店，拿起手機發現有封簡訊，頭昏腦脹的我半闔著眼皮打開簡訊，快速看過內容以後，不禁脫口而出：「不會吧？！」因為簡訊內容寫著：「你上啦！而且是正取最後一名！」我想傳簡訊給我的 K<sup>7</sup>很有可能是在捉弄我，畢竟這真的很扯。馬上播了國際電話回台灣給 K。K 笑笑的跟我說，這不是惡作劇而是真的，並且叫我回台灣之後自己上網查證。哈，我該說什麼呢？不，應該說，我還能說什麼呢？因為我已經在這裡（研究所）了。

---

<sup>7</sup> 二技時期的同學。

三年前我對研究什麼一籌莫展，三年後的我，仍然一籌莫展。但是，我還在努力。

常聽到有人這麼說：「反抗有什麼用？努力有什麼用？憑我們微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改變什麼！想改變世界是不可能的！那幹嘛還要繼續反抗、繼續努力？」聽到這樣的話，我總是不以為然。憑一己之力當然不可能改變廣大的世界，但是我相信，是可以改變這個世界的一小部份，哪怕只是一點點、一滴滴。覺得不甘心不甘願，那麼就說出來，不要因為說出來又不能怎麼樣而放棄了可以發聲的機會和權利。因為沒試過，怎麼會知道結果是什麼？這樣的信念，支持我走過對「論文」研究題目一籌莫展的時刻。縱使我無法確定「論文」題目，但是我知道我有話要說，我知道我想要說什麼。只是我懷疑，「想說」就可以成為「論文」嗎？

此刻我又告訴自己，「沒試過怎麼會知道？」

記得那天（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晚上，在阿川<sup>8</sup>的研究室裡進行的「論文」討論會上，我把寫好的初稿檔案給了同學J<sup>9</sup>和學弟N<sup>10</sup>。N看到「我說」這個章節的前半段便迫不及待問我：「為何是從研究所入學考試開始寫起呢？我以為『自傳』該是從小時候開始回憶、開始寫起的。」

N的這番話讓我想起，曾經我也覺得「自傳」應該就是要從小時候有記憶的階段開始寫起，就像大部份偉人傳記般按照時間的序列來細數過往經歷，又，生命經驗是環環相扣的，長大後的作為多少都與幼時經驗有關。不過前述也提到，生命其實不是1, 2, 3, 4...這般的單一數列＝事件，而是眾多數列＝事件交相錯綜匯集而成，數列＝事件之間有時有規則的接續出現，有時毫無規則的斷然消失。

因此，「從別具意義的事件開始寫起」的想法取而代之，而那個「別具意義的事件」立即聯結到的便是造成我現在和「論文」苦鬥、生不如死的起始點。心不甘情不願的寫著「論文」，又矛盾的說服自己：是自己作的決定所以應該勇敢認真的努力才對，下一刻又開始懊悔當初報考的決定。如此不停的來回反覆，在本文寫作過程中可謂對這樣的自己感到不勝其擾，所以我決定回頭看看，研究所這一路上我到底是如何顛簸搖晃、步伐凌亂的走過來，為何到執筆寫作本文的現在仍舊無法穩穩的往前踏出下一步？

---

<sup>8</sup> 我的「論文」指導老師。

<sup>9</sup> 研究所的同班同學。

<sup>10</sup> 研究所的學弟。

「我說」這個章節從對入學考過程的細節描述來烘托對於「論文」的無知、抗拒、矛盾和莫名堅持，想表達的其實是「說出來」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氣」。「想說」不必然說得出口，「想說」也不必然找得到聽眾，「說出來」也不必然就會改變什麼。

寫到這裡，我又想問讀者：你會想要「說出來」嗎？你有「說出來」的「勇氣」嗎？那個「勇氣」是從何而來？又，為什麼你說不出來、不想說出來？

## ● 爲了什麼而說？

是的，「沒試過怎麼會知道」這句話乍看之下富有一種勇於嘗試的膽量，但另一方面也可嗅到說話者的愚昧與無知。植基於這樣的膽量與無知，我開始似有若無的找尋能夠藉由「論文」說出想說的話的方法。

「論文」之於我，是對話也是書寫、是發聲也是實踐、是批判也是反抗的場域，如果我不說也不寫，不會什麼都沒有，只會失去一個可以發揮的「場域」，但是我找不到理由去放棄這個「場域」。

在寫作過程中反覆的自問自答是一種自我的對話，自我對話之後，接著將開始與他人對話，例如：指導老師、同學、學位考試的評審，然後是圖書館的社會大眾等等其他讀者。寫作期間仍將不斷的進行自我對話，即便「論文」結束畢業了，自我對話的進行將會持續進行。

書寫是一種行動，也是一種實踐，就個人無法自社會跳脫的角度來說，這樣的行動與實踐雖然來自個人，卻也是映照出社會的某些面向。

雖然它是批判的，但絕非流於謾罵圍剿的批評而已。批判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對於自身或自身之外之人事物有意識的觀察、分析與反省思考。

發聲即是一種反抗。雖然默不作聲也是一種反抗，然而比起噤聲，我認爲個人能夠向社會發聲、對話的機會並不多，尤其是這麼具有公開性的管道。畢竟我不是專職作家，也不是每次向報社投稿就會被徵選上的業餘寫手，雖然我也可以在網路部落格公開發表我的言論，然而我設定的首要目標讀者群並不在於透過電腦、網路就可以觀看閱讀的親朋好友或恰巧搜尋到這篇文章的陌生大眾（他們是次要目標讀者群），而是與「論文」、研究所等學術教育機制息息相關的人。

學術與教育是一種反省，反省從社會得到了什麼的自己，也反省自己所融入的社會。透過這篇文章，我想要藉由自我對話的方式從中找尋這樣的行動實踐能映照出何種社會面向。

先談談本文的目的。

為什麼我非得「發聲」不可？為什麼我要「反抗」？又為什麼非得是用寫「論文」的方式？很多很多的問號在我腦子裡打轉，但始終找不到滿意的答案，例如

前述這三個問題。

很現實又簡潔的回答其中一個問題：我想畢業，所以我寫「論文」。不過，我為什麼要「反抗」？為什麼要「發聲」？我在「反抗什麼」又在「發出什麼聲音」？

對我而言，我是在發出一種「反省」的聲音，藉由本文，反省自己、反省周遭、反省社會。我反省自己看不到全部面向的狹窄視角，我反省來自周遭的眾聲喧嘩，我反省社會弱肉強食的現實殘酷。而我在反抗什麼？我反抗的也是自己、也是周遭、也是社會。我反抗自己的狹小眼界，反抗周遭的喧嘩眾聲，反抗社會的現實殘酷。但是我之於社會，社會之於我，「反省」與「反抗」真的就能逃離來自自己、來自社會的「框架」嗎？現階段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但我想試看看，我想試試看能否找出框架的細縫，試著擠身而過，就算只有一根手指，就算最後只是找到細縫而已。然後，搖晃不安之中，我決定從「書寫」開始。

書寫是框架建立的過程，也是跳脫框架的可能。書寫是刻畫，是創作，書寫的產物是證據也是足跡，但是書寫同時也是抹滅，也是無中生有，書寫的產物也是謊言更可能只是幻想。書寫是自我體現的方法之一，也是阻礙自我體現的高牆，無論進行書寫的目的為何，擁有「讀寫能力（literacy）」的人才能順利通過書寫的大門。作為一種發聲、一種創作、一種印記的刻畫，讀寫能力成為先決條件的書寫成為「某些人」的特權專利，成為「某些人」發聲的獨有管道，成為「某些人」代筆他人的絕佳利器。進入書寫大門之後，選擇／排除的情況繼續存在，例如：用什麼「語言」來書寫？有人能夠精通多種語言，有人卻只會單一語言。而「語言」不必然等於「文字」，例如早期的原住民社會並無文字，直至近代才開始創造文字試圖追溯保留族群歷代以「口述方式」承傳的歷史。因此，在「文字」被視為一種「進步」的象徵與表現的現代，「書寫的意義」所涵蓋的層次更加複雜又令人玩味。

再者，書寫主題／主體／對象是如何決定的？以「人」來說，有人書寫自己＝自我敘說，有人書寫他人＝為他人代筆，具體的將經驗、情緒與感受盡其可能的找到適切的文字，然後持續的組合、累積、推疊文字以形成一連串「有意義的排列」。但為什麼我寫自己，卻不寫他人？「留下」真的有其必要嗎？留下的「什麼」是「有意義」的嗎？



## 一、轉向再轉向...最終，找到目的地了嗎？

最早想把焦點放在台灣原住民與後來移民者之間的交流互動上，但是因為「後來移民者」在定義上難以界定（例如：「後來者」是指漢人嗎？但漢人當中，又有閩南人及客家人以及跟隨國民政府退守台灣的外省人，是要設定哪一個族群呢？又，是什麼時期的「後來移民者」呢？），而所謂的「交流互動」又是指什麼？是商業關係？還是族群衝突？還是植民與被植民的關係？想來想去，都沒辦法決定，後來便不了了之。

後來想到，「我」其實就是個不折不扣的「後來移民者（漢族：閩南人）」後代，何不以自己為「後來移民者（漢族：閩南人）」的觀點出發呢？然而，問題又再次繞回後來移民者的定義上。雖然我是漢族：閩南人，但是我在台灣土生土長，就這個層面來說，我也是「原住民」，怎麼會是「後來者」呢？然後，又不了了之。

接著又想，何不以原住民的生命故事為主題呢？

參加活動計劃<sup>11</sup>時開始接觸到「生命史／生命故事」這個字詞，那時活動計劃正好在進行採訪「某些人」，聽他們講述他們歷經日據時代、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戰後（此指日本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的個人記憶及經驗。過程中我發現原來「個人史」真是有趣，尤其每個人歷經的生命過程都不同，不會有一樣的故事內容，即使大時代的背景相同，又或者他們遇見了相同的人事物，但是因著不同的人其講述方式不同，所呈現出來的「個人史」頂多也只有相似但絕不相同。不過回到課堂討論時，有時候也會被提醒「說故事有時候是一種表演／演出／演技，其講述的內容有可能不是真的」（即便如此，我仍然驚嘆著這一部部「生命史」的上演內容）。只是真真假假，誰能分辨？「南京大屠殺」與「希特勒滅殺猶太人」這些世紀大慘案是真是假，放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以及由不同的政治立場來觀看，答案至今仍舊眾說紛紜，也一再的被拿出來重新討論，又有誰能夠讓歷史「定案」？只是老師會附帶提醒一點「我們能夠從中得到一點蛛絲馬跡的是，講述者如此陳述的原因理由，也就是講述者的政治性」。為何想要這麼說？為何提 A 事件卻不提 B 事件？又為何一直重覆提起 C 事件？因此，在參與活動計劃採訪收集「個人史」的過程當中，我了解到：如果「敘說」是一種經驗的呈現，那麼真假不是檢視其敘說內容的重點，其重點是在於獲知其敘說立場為何。過程中我逐漸被「個人史／個人的生命故事」所吸引，因為別人所說的關於他們自己的故事，都是我未曾經歷也不可能有機會經歷的。

---

<sup>11</sup> 所謂「活動計劃（project）」為東海大學日文系研究所的必修課程，當初約有五個活動計劃可供選擇參加。

喜歡聽故事又發現「個人史」的特點／意涵，加上此時又意識到自己與原住民之間似乎存在「某些關係」而不斷思考「到底有什麼關係」，又想「代替別人發聲」（當時在內心設定台灣原住民族是弱勢族群，需要他人協助），所以想藉由「論文」來呈現原住民的「個人史」，並希望藉由「個人史」的增加，逐步累積民間對抗官方歷史強權壓迫的能量。

獲得協助者的同意之後，我開始和對方進行對話／訪問，並且依據對話內容作了簡單扼要的訪談大綱記錄。撰寫訪談大綱過程中卻隱約察覺到，原來在我內心，其實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比起未見過原住民的人還要深層而且根深蒂固——我將熟識的原住民朋友從我內心所認知的、被社會建構的「原住民形象」當中抽離，同時，隨著愈將朋友抽離的愈遠，我內心所認知的、已被建構的「原住民形象」卻變得更加清晰；另一方面，頻繁的與部落原住民接觸之下，我發現隨著接觸經驗的累積，更加印證了部落原住民與我內心所認知的、已被建構的「原住民形象」是多麼的吻合。於是便想在聆聽許多他人的生命故事之後，藉由回頭審視自己，試圖解析生命過程中致使上述根深蒂固的「原住民形象」以及將原住民朋友「特殊化」的形成原因。

不過在那之前，將先交代促成本文的相關背景。

首先，是我和日語的關係。

在現實生活中，「我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這樣的「出發—抵達」不斷的反覆上演，每次上演的「出發—抵達」之間亦互相牽引連動，上一次的「抵達」與下一次的「出發」也互為因果重疊。此外，那條橫互在「出發」和「抵達」之間的細線其實是由無數個點所組成的，這正說明：從出發到抵達之間要歷經多少事物，然而那些往往不容易受到注視，總被輕易帶過。

進入研究所，「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的戲碼再度上演。把「論文」從裡面抽出來放大檢視，又看見了架構相同的戲碼。只是在「論文」這部戲裡，我的角色不僅是演員而已，同時是編劇，也是坐在台下看自己演出的觀眾。換句話說，在「論文」裡，我同時演出「演員」、「編劇」和「觀眾」三個角色，雖然對於自己的表現並沒有任何把握，但我嘗試去盡力了。

那麼，為何在「論文」裡我要同時擔任三種角色？

因為，我看不見下一個「抵達／出發」...因為，我迷失在聽見的別人的生命故事裡。我聆聽著他人的訴說，被他人動聽的故事吸引，逐漸跟隨他人的訴說沉溺在他們的故事裡，然後有一天，我突然驚覺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道自己為

何來到這裡，又為何在此停留，既找不到自己要去的目的地，也不知道每次經過靠上前去到的岸邊是否連接著「想到達的地方」。

我看不見前方，不知道下一步要踩在哪裡，所以只能畏縮的原地踏步、躊躇不安，直到我想起「後退原來是向前」這句話。於是轉身換個方向，(終於)我邁開步伐(出發)往後／前走去，試圖透過演繹三個角色(寫、演、看)，讓自己能夠沿著走來的足跡回溯一路上的風景和原初的起點，即使心情不再相同，即使步伐不再穩合，但我仍盼望藉此能夠讓自己明白當初為何迷失、為何停留、為何不能勇敢踏破前方迷霧的理由。

另外我也想知道：同一次的「出發—抵達」，其目的地只能有一個嗎？可否是複數以上的？或者有什麼例子可以說明目的地是複數以上的？例如我只知道「出發」和「抵達」是兩個不同的點，方向是從「出發」朝向「抵達」行進，但有沒有「出發」和「抵達」是三個以上不同的點，方向是從「出發」朝向另外兩個「抵達」行進的例子呢？

## 二、爲什麼是日語？

日文之於我，從最初的接觸到現在決定使用它來寫作本文，它的意義或是角色或是功能一直轉變，過程有點錯綜複雜，但我「簡單」呈現。

和日文最初的接觸要從我的阿公開始說起。根據阿爸的說法，阿公受過日本教育，但是到底學了幾年，卻沒有特別交代，而且我也沒有親身跟阿公聊過這方面的話題，所以關於阿公老年以前的故事絕大部份都是從阿爸那裡聽來的。這或許也跟我小時候覺得阿公嚴厲又嚴肅有關係，對阿公有種避之惟恐不及的懼怕感，總是不太敢跟阿公單獨相處，也不敢向他問起一些私人的話題；但也許那時我還太小，沒能來得及像現在這樣對阿公的故事感到好奇，只能遺憾再也沒有機會親自詢問阿公關於他那個年代的故事。阿爸說，阿公以前是綠島赫赫有名的船長，與海有關的一切樣樣精通，或許是個性好強不服輸的關係，對任何事物總表現出嚴肅的態度，即使對於家中大小的管教，阿公也是一貫嚴厲的態度。雖然印象中阿公很嚴厲，但是在我的某段記憶中，阿公卻意外的相當和藹，而且那和藹模樣至今依舊鮮明。在我年幼的時候，每當阿公和阿媽來到我們家住，夏夜飯後只要阿公心情不錯，他就會一手牽著小弟一手牽著我，帶著我們出外去散步，乘著晚風一邊散步然後一邊教我們唱「桃太郎さん、桃太郎さん……」這首「桃太郎」的日文兒歌，我和小弟沒學過日文倒也每次都跟著阿公伊伊呀呀的唱和。這是我人生當中第一次非正規的學習日文。

接著，在我大約國小五、六年級左右，阿爸參加公務人員升等考試，考者必須從英語、日語等等外國語文當中選考一種，而當時學歷只有商校畢業的阿爸，因為阿公的關係對於學習日語的興趣大過英語，所以選擇以日語來赴考。阿公沒有教過阿爸日語，所以沒有基礎只有興趣的阿爸就到私人補習班去學習，那時候尚未正式學習日語的我一直以爲能夠用來上考場的阿爸的日語程度一定非常的好，直到五專時選讀了應用日文系，阿爸告訴我，他其實學到動詞五段變化時就沒再繼續學習了。然而在我學到之前，我一直不懂阿爸到底爲何會就此中斷日語的學習，等學到之後才了解阿爸是因爲動詞五段變化的規則過於多變繁瑣，加上年歲漸增與工作生活忙碌的關係，才使他中斷了日語自學。對阿爸來說，「會說日語」是他內心一個未竟的小夢想，因此在那個大學至上、英語至上的年代裡，他才會支持我放棄就讀高中轉考技職專校並選讀日文相關科系的決定。不過前提當然也是因爲他尊重作爲女兒的我的想法與決定，而不是專制的硬要我接受他的安排，這一點在當時阿公保守管教的陳姓家族裡頭，其實是種異端。阿爸曾不只一次告訴我，他不喜歡阿公阿媽重男輕女的教育方式，雖然他是男生，但是對他來說，他覺得兒子女兒都是自己的孩子，都一樣的重要，所以他非常無法接受阿公阿媽重男輕女的觀念與態度。因此他總是對我們說，將來對自己的兒子女兒絕

對不會像阿公阿媽那樣，他要一視同仁，因為都是他的孩子。以前我也覺得阿公阿媽對大哥跟小弟的態度明顯跟對我和姐姐的態度不同，所以非常贊同阿爸所說的「不要像他們一樣重男輕女」。只是對現在的我來說，則有了不同的想法：在阿公阿媽的年代裡，重男輕女是家常便飯，即便是女兒出身的阿媽也用同樣苛刻的態度對待自己的女兒並沒有所謂的對錯，他們只是承接了上一代的方式去教導下一代，尤其在農業社會裡，前人的經驗往往是學習的對象與做事的準則，因循前人腳步的他們沒有義務要背負我們對於他們做法是對或錯的檢視，只是阿爸不同於阿公阿媽的教育方式，確實給了我很大的空間可以為自己的人生作選擇。

因著阿公與阿爸的關係，日語在我的人生當中有了一個小小的位置。

就讀台東女子高中時雖然是在前段班，不過一年級下學期時因為當時級任老師「不當的」教學態度及偏激言語污辱，讓我再也受不了那種每天上課猶如去受罪的高中生活。在阿爸的支持與協助之下，我投入五專升學考試的準備，並在考取五專志願學校之後，向高中辦理休學手續。那段準備轉換跑道的日子過得並不比寫「論文」的現在輕鬆，因為在阿爸的多方考量之下，他認為應該等考取之後再休學會比較妥當，算是預留後路吧。所以在那段時間裡，我不僅要兼顧原本的高中課程，同時也要在課後騰出時間去準備五專入學考。阿爸為了幫我爭取時間，就把考試科目的內容（好像是歷史或是地理）用「唸」的方式錄音起來，讓我可以不用捧著書本就能用「聽」的方式來準備考試。這樣確實方便許多，即便常常是睡前聽著錄音帶聽到睡著了，但我一直覺得真的多虧阿爸想到這個方法，否則當時我根本無法兩者兼顧，想脫離高中生活之事可能也無法成真。到了要填寫志願科系時，阿爸跟阿母還是提醒我不下數次：「難道不考慮唸英語相關科系嗎？唸日語的出路不太好找吧？」其實從懂事起，根本沒好好想過「出路」這件事，根本沒有意識到「將來要作什麼」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只是國小畢業了唸國中、國中畢業了唸高中這樣循序漸進的依照一般社會期望在繼續我的學業、進行我的人生。就連轉考五專填寫志願時，還是沒有把「將來要作什麼」這個問題放進我的思考脈絡之中，那時的我只清楚的知道自己對於理工商業科系毫無興趣（或者說完全不了解），但對語文方面卻有著一種莫名的嚮往。這種嚮往來自於何處呢？除了前述的日語經驗之外，確切的時間點大概就是始於國小五年級的那年暑假了吧。阿爸把我送去私人的英語補習班，希望我儘早將英文基礎打好以應對未來的大學聯考（但奈何女兒卻中途轉向）。雖然國中階段的英語考試表現不是頂尖，但是早年接觸英文卻使我對於英語的學習不懼怕，間接造就對「英語」失去了好奇心，五專填寫志願時也就不再考慮選填英語相關科系。對那時的我而言，日語是一個全新的開始，相較於英語也令我感到好奇。當時學習英語不僅是世界潮流，在台灣也成為潮流，各所學校排名在前的語文相關科系皆是英語。所以即使成績能夠就讀英語科系，但我仍舊選擇了日語科系，雖然最後無法考取我

一心嚮往的學校——文藻語言專門學校<sup>12</sup>，但是想起痛苦難耐的高中生活，我寧願接受阿爸朋友所推薦的新興專門學校就讀。於是人生第一次出遠門獨自生活就從就讀私立高苑工商專科學校<sup>13</sup>的應用外語科日文組<sup>14</sup>開始。

五專入學初期，某天某位老師在課堂上問大家為什麼來讀日語時，約有半數以上的同學回答說：因為分數不夠選填英語科系因此退而求其次的選讀日語，其他同學則說因為哈日而想學習日語。此時我才發現原來班上單純想學習日語的人並不多。我確定自己不在那大部分的人當中，但不確定自己是不是哈日族，因為我既不喜歡日本明星也不嚮往日劇的浪漫情節，只是在姐姐的影響之下從國小開始喜歡看中譯本日本漫畫，國中開始會用零用錢買回家收藏（就算被父母打罵仍然無法中斷），可是從未有為了漫畫而想學日語的念頭。我看漫畫也想成為漫畫家，更享受漫畫世界裡的恣意狂想，但就是沒想過要學日語去看日本原文漫畫，加上台灣或香港作者的漫畫我也看也收藏，這樣的我到底算不算是哈日族我也搞不清楚。不過假如和其他哈日族的同學比較的話，我一定會被說：你那種程度不算哈日族。當然我學習日語的動機並不單純，完全只是為了脫離高中生活，加上阿公和阿爸的日語學習經歷影響，使我在五專初期帶著好奇心開始對日語產生極大的興趣。然而，體驗多采多姿的學生生活之後，卻讓五專後期的我無心於日語的學習，尤其社團活動比起課業更教我為之瘋狂。

因為升學考的關係，國中時期沒有太多時間可以參加社團活動，直到上了高中才開始了解「社團活動的迷人之處」。某天同學們提議自行創社，說也奇怪，可能是課業壓力需要釋放吧，幾位同學便迅速著手創社事宜，並且同時演練一些親自編寫的搞笑戲碼在學校活動上公開表演。那是一段極其快樂的時光，瘋狂搞笑的戲碼總讓排練笑聲連連，大家也因此暫時忘卻課業上的繁重壓力。好景不常的是，到了高一下學期分組分班後，快樂的時光全被新班級的導師不合理的要求所壓縮了。後來離開高中的我沒能和同學們一起努力並親眼看見新社團的創立，但是聽說社團創立之後成為學校第一熱門社團的那一刻，心中除了感到欣慰之外，內心那份對社團的參與熱情也因此被提醒了仍然存在的事實。來到與高中截然不同的專門學校，校風開放並且極其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我非常珍惜的參加了好幾個社團，也成為社團幹部舉辦活動。此時學業對我來說再也不是校園生活的唯一，從社團活動當中學習到更多課業上無法學得的事物，而這樣的過程深深的吸引著我，並且蓋過對日語的好奇心。是故，五專後期我並沒有放很多心力在課業上，對於日語也沒有很用心的學習，檢定考試的合格分數也一直都是處在

---

<sup>12</sup> 現改名為文藻外語學院，位於南台灣，在語言教學方面相當著名。

<sup>13</sup> 創設於 1986 年，前身為私立高苑工業專科學校。1991 年更名為私立高苑工商專科學校，1998 年改制為高苑技術學院，2005 年起改名為高苑科技大學。我於 1996 年 9 月入學五專部，於 2001 年 6 月畢業。

<sup>14</sup> 應用外語科五專部創設於 1993 年，當時僅有英文組，日文組則於 1994 年增設。1996 年入學的我為日文組第三屆學生。

低空飛過的程度而已。只是很奇怪的是，我對日語本身失去了興趣，但臨到五專畢業前夕，卻還是報考了日語相關科系的升學考試（二技推甄、插大）。填寫志願時選擇了不需要面試的學校，除了個性膽小，也對自己「說日語」的能力沒有信心。不用心也可能是能力有限，五專後期以來「說日語」對我而言成爲一件痛苦又困難的事，但好在在校成績還算可以，後來也如願考上志願學校——不需要面試的國立台中技術學院應用外語系日文組<sup>15</sup>。

二技的學制在校時間短暫，因此社團活動時間少，加上很快就要面臨畢業，幾乎是還來不及熟悉環境就得開始規劃未來，於是這段時期對社團活動的熱情已然失去可以發揮的空間。進入學習日語的第六、七個年頭，實用性日語的學習仍舊引不起我的興趣，例如：日語口譯、新聞日文、商用日語等等。規劃畢業的出路時，徘徊就職與升學的交叉路口，我非常不知所措。繼續升學就是研究所碩士課程了，當時（2002-2003年）日語相關研究所的課程對我而言幾乎都是沒信心考上又沒興趣去考的，例如以研究日語語法／文法、日本文學、日本政治或經濟爲主的課程，雖然這些在課堂上多少都學過，然而只懂一點皮毛的我卻說不上感興趣；對自己的日語能力沒有信心，連帶著也對自己畢業之後是否能順利投入職場感到頗多懷疑，再者是否要回到家鄉就職還是繼續留在外地的考量也讓我非常困惑。其實當時曾想學人家出國留學什麼的，一種崇洋昧外的虛榮心作祟，並非真的想去深造學習什麼。只是家庭經濟狀況不允許，遂根本不敢奢望這條出國之路能行得通。當我徘徊不前、焦躁不安時，K（與前述爲同一人）向我推薦大眾傳播所的補習班課程，並邀我一同前往試聽。在大傳所補習班試聽課程中首次接觸到社會學相關理論，甚是覺得有趣，然而只有興趣沒能融滙貫通是無法順利考上錄取率極低的大傳研究所，因此內心仍然排斥成爲社會新鮮人的我結束七年以來一個人的生活，打包行李決定先回家鄉好好想想再說。

回到家鄉的那一年（2003年夏天到2004年夏天），依舊維持自1997年以來每年12月初參加日文檢定考的慣例，只是在畢業的那一年，檢定考多了一項功能，它成爲我拒絕踏入社會的一個冠冕堂皇理由，尤其是用來抵擋公務人員的阿爸對我報考國家考試成爲收入穩定公務人員的期望。等到考完第三次一級檢定考之後，在家當了半年米蟲的我再也找不到理由去塘塞阿爸，便就近先找了一份兼差性質的工作，試圖減少在家的時間好逃避阿爸的緊迫盯人。打工經過半年，開始放棄自己無謂的堅持，拿著辛苦打工賺來的錢去補習班報名公職保證班，打算把兼差辭掉開始專心準備公職考試，內心也暗自盤算著將來倘若順利考上公職的話，絕對要憑著自己的力量存錢找機會一圓留學夢。不過才上了幾堂課，便開始後悔了。我後悔這樣日覆一日上補習班苦讀的生活確定是我最想要的嗎？然而報

---

<sup>15</sup> 創立於1919年，歷史悠久，於1999年由商業專科學校改制爲技術學院。1980年創設五專部應用外語科日文組，2000年增設二技部應用外語系日文組，2004年起更名爲二技部應用日語系。我於2001年9月入學二技部應用外語系日文組，於2003年6月畢業，爲二技部第二屆學生。

名費都已經繳了，不繼續上課還能怎麼樣？誰知過了不久，將近四萬塊的補習費我還是讓它付諸流水了。

某天，久未聯絡的 Y<sup>16</sup>突然打來電話，告訴我她任職的公司目前有一個職缺，問我願不願意前往面試。當下我不敢貿然答應同學，因為我已有半年時間沒碰日文了。不過在 Y 積極鼓勵與阿爸的建議之下，我仍硬著頭皮去面試了，沒想到一試便上，於是我便決定勇敢踏出畏縮的腳步，捨棄家鄉再度外出，重新回到處處是日語的環境，只是這次是前往職場，以新鮮人的身份去使用日語。進入公司之後，我才發現原來公司是跨國合資的，職員除了台灣人與日本人之外，還有很多歐美及東南亞國家的工程師，因此不僅要會日語，英語也不時會用到幾句。好在我的工作職位並不太需要開口說話，但也因此在兩年之後，我的日語「說」的能力仍舊和剛畢業時沒有太大的差別，加上對於日語的學習一直不求精進，以至於考上東海日研所（這裡）時，我簡直驚訝到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

入學前對於東海大學並不陌生。三角形的教堂以及廣濶美麗的校園曾讓我以觀光客的身份前往參觀；二技面臨畢業時，也曾經上網查詢過東海日文系是否開設研究所（但結果令人失望），並順帶查詢了學部課程，卻意外發現東海日文系的課程「看起來似乎很不一樣」。但是二技就快畢業（2002年）的我怎麼可能再讀大學呢？便把「看似有趣的課程」整個丟到腦後去。2006年東海日文系研究所首次招生的消息起初我並不知情，而是再一次經由 K 的通知與鼓勵才得以知悉並報考，但是我仍然不抱著希望。一方面工作忙碌，另一方面因為考試的第二階段需要說日語，因此最終能夠錄取只能說不願浪費報名費的堅持是考取的最大原因。

到這裡為止，日語之於我是一個工具、一項課程、一種學習，最初對它的認識來自於阿公和阿爸，但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它會出現在阿公的學習歷程裡？為什麼阿爸提到日本或日語會有一種崇尚的感覺？為什麼父母會有學英語比學日語好又出路多的想法？即便國中歷史課本上提過台灣曾被日本殖民 50 年，即便在大傳所補習班學過「文化帝國主義」，然而對我而言那段歷史卻好遙遠，與我無關緊要般。

研究所入學的新生說明會上，第一次和我交談的阿川在休息時間問我：「為什麼剛才自我介紹時，要說自己姓チン(chi-n)，而不說自己姓「陳(イロノ)」？這沒由來的劈頭一問，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回應。不是聽不懂老師的日文，而是聽不懂老師到底想要說什麼。等到正式上課後，漸漸的在面對許多未曾感到懷疑並覺得理所當然的事物時，倘若試著以懷疑的心態、敏銳的觀察力——也就是所謂的「問題意識」去重新看待的話，便可發現理所當然的背後掩蓋掉多少人事物

---

<sup>16</sup> 二技時期的同學。



的存在，對於老師的問題我也才有了一番自我理解。1996 年從五十音開始學習日語，到了 2006 年才發現日語之於台灣挾帶著殖民與後殖民的意涵，其中還包含了權力關係。正式上課以前，長期以來一直擔心自己「日語說得不好、不順暢」，對於以討論形式為主的授課方式也感到莫名恐慌，加上同學當中有不少日籍學生，讓我對於說日語的自卑感更是提升到了頂點。好在正式上課後，課堂上中日語混雜使用或同學老師之間互相翻譯解釋的情況讓我稍微放下了心中大石，因為大家似乎認為溝通的實質意義超越語言的實用性，雖然溝通必需藉由語言，然而語言可透過他者轉譯（雖然轉譯之間難免「失真」）或用肢體動作來彌補不足，但是傳達出自己的意見與想法卻是無法交由他人替代。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我的心態開始轉變：以前把重心放在「說日語」，現在則把重心放在「說出自己的想法」；縱使日語能力不足，然而不足的部份有其他方式可以去彌補。課堂討論或是同學之間的閒聊，「日語」從以前的「自卑象徵」轉變成「自卑與自信矛盾的摻雜更替與重疊」的象徵。只是歷經研究所的訓練／浸泡／保護，實在無法保證走出這裡（東海）之外，「說日語」之於我是否會再度變回以前的自卑象徵。

2007 年春天，首次的海外學習之旅和老師同學們一同前往韓國，行程中有一天和韓國的日文系學生互相就各自對台灣與韓國的認識作交流，過程是使用日語進行。對於在場的韓國學生的日語說聽流暢度我感到非常驚訝，縱使曾聽 M<sup>17</sup> 提過韓語與日語之間的文法相當類似，但是他們應答如流的從容不迫卻仍使我忍不住往後退縮；2007 年暑假，前後參加了兩次海外學習之旅。在岡崎之旅的公開發表會前夕，大伙求好心切熬夜加緊討論排練時，日語表達能力不佳再度形成我的一股壓力，造成我與同組日方學生之間對於發表內容有了認知上的差異，連帶引發我的情緒控管略微失常；菲律賓之旅遇見一位當地日文系的大學生，雖然她的日語帶著腔調，然而她的落落大方與侃侃而談卻讓我開始質疑是否是自己個性太過封閉的因素而導致日語能力不佳。一次又一次的海外學習之旅，讓我面對日語總是不斷來回於自卑與自卑自信交疊之間，雖然系所老師不會要求學生的日語要像 native 一樣，然而我知道，想要準確傳達自己的想法時，俱備「讓人聽得懂的日語表達能力」是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

從「單純想把日語說好、像 native 一樣」，到「爲了把自己的想法傳達出去而將對方納入考量的把日語說好」，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倘若沒有經過研究所的洗練，我不知道是否有機會能夠體認。

說完我的日語學習歷程，接下來要說明上述這些日語學習歷程和本文之間的關係。

就從回答一個在前述內容當中已經非常明顯的問題開始說明：既然日語表達

---

<sup>17</sup> 本文的協助者。

能力不好，為什麼還要用日語來寫作？

系所並無規定學生一定要用日文寫「論文」及用日文發表論文。這跟系所的基本理念與課程是以「多元文化交流」為主軸有相關性：鼓勵學生不受限於語言，多方接觸不同領域的人事物並持續進行交流。當然依指導老師不同可能會因「論文」需求或其他考量而要求其指導學生用中文或是日文來寫作，例如：對於指導老師或學生而言最有利於表達的語言、「論文」關照的對象或者將來是否前往日本留學等。關於這一點我承認一開始會決定要用日語寫作的最直接原因在於「論文」指導老師是日籍老師。縱使阿川俱備了某些程度的中文說聽讀能力（「寫」的能力有些微妙，因為日語當中有些許漢字其實跟中文很相似），而且他也未硬性要求用日文書寫，但是倘若要讓阿川看懂我在寫些什麼，從便利性來看日語是比中文來的好，雖然老師也不見得看得懂我在寫什麼；另外從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權力關係來看，我的確服膺於這層關係之下，雖然老師採取尊重學生的方式進行指導，但是在知識與經驗面前，我是屈居於老師之後的，縱使想撇開這個層面的差異，但終究無可奈何，如果我想在「論文」寫作方面獲得老師的指導，用日語寫作無非是最直接的方式。不過直接使用日語寫作「論文」對我而言是有困難的，承如上述內容提到，我並沒有特別在日語的學習上下功夫，因為對於日語本身失去了絕大部份的興趣，因此在日語的說聽讀寫方面並無法為我帶來成就感，也不會因為自己曾在日商公司任職而覺得在日語方面獲得成就感。相反的對於自己的日語說聽讀寫能力，我一直呈現「心虛」的姿態。1996年9月到2003年6月連續7年的應日科系學生身份、2年日商公司任職經驗、2次赴日經驗加上低空飛過的日本語一級檢定合格證書，這些都讓我在面對家人或朋友時，份外對自己有負眾人期望的不努力感到「心虛」。進入研究所之前，我對「論文」的想像一直處在不敢踏近一步卻又想一探究竟的觀望心態，總以為日研所的「論文」無非就是要用日語來寫作，既然如此，連助詞都還會用錯的我怎麼可能勝任的了？不過進入研究所之後，這樣的想法有了轉變。如果溝通與交流的前提是要有「跨領域」的實際「跨越」行動，而不是非要具備完美、正確的語言的話，那麼「不完美」的日語為何不能拿來寫作「論文」呢？雖然「論文」是俱公開性質的文章，然而若將「論文」視為是一種對話溝通的方式，加上公開性質的文章並沒有非要完美呈現不可，那麼我為何還要拘泥於以往的「心虛」和「自卑」呢？老師或許會修改我的「論文」，但是這並不代表我不能用「不完美」的日語來寫作，即便最後的呈現可能已經不是最初的原貌。

然後，我開始架構本文。

內心對於「日語」的糾葛始終複雜萬千，其間所牽涉到的「人事物」也是多如牛毛。從「native 的日語」到「屬於自己的日語」，或者是中文還是英文，我

始終無法跳脫「文字是進步的象徵」「書寫是進步的表現」這些對於「讀寫能力」的迷思。但，真有跳脫的可能嗎？又，該如何跳脫？

### 三、「論文」是有個性的—作為一種抗拒主流的方式

除卻封面、摘要、參考文獻、附錄及作者註記，「論文」的本文就像一個人的個性，每個人的個性都不同，連帶的每個人說話的方式和語氣也不同。

查詢提供「論文」寫作相關格式與注意事項的「論文寫作學習網」網站<sup>18</sup>在「論文」基本格式方面提到：一般屬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的撰寫基本格式大都是以美國心理學學會(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簡稱 APA)所制定的出版手冊為準。這本手冊雖然是以英文的研究論文為主，但其中有不少的撰寫方法也很值得國內的學者參考。林天佑教授(2002)撰寫之 APA 格式第五版當中提到「本文部份包括緒論、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與建議。緒論部份包括：研究問題與背景、研究變項的定義、研究目的與假設。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對象、研究工具、實施程序。研究結果在忠實呈現資料分析的結果，結論與建議應先指出研究結果是否支持研究假設，其次依據研究結果的一致性與差異性，以及相關文獻，引出結論，再依據結論做建議，其中也可略述研究的限制」。瀏覽國內碩博士論文網站上人文社會科學類別的「論文」時發現絕大多數皆延用上述架構，只有少數跳脫其制式架構。

APA 所制定的出版手冊在於「提供參考」，讓初次撰寫學術論文者有所依規而不至迷惘，然而僵化的架構不該成為審核「論文」時為了有所依據的一套「標準」，尤其這套「標準」是為建構一個「客觀」的審核過程。

再從「論文」的寫作來看，以審核一個人是否具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而可獲得學位作為認可的考量下，「論文」要由「一個人」來寫作，否則便難以評判其人是否具備獲得認可之能力。然而，「一個人」並無法兼顧所有面向，是故要提出許多理論及多種角度來填補「一個人」能力所不及之處以及減少「一個人」容易犯的弊病及偏頗。但是再怎麼提出多方觀點及來回修正，作者始終都只有「一個人」，雖然「一個人」可以容納多方觀點之後加以融匯貫通，終究還是「一個人」，即使收集眾多資料、採納眾多意見，不過，收集什麼資料、選誰進行訪問，也都是「一個人」作下決定的；引用／引述哪段資料、截取哪段對話，也都是「一個人」作下決定的；縱使外在因素（指導老師的意見、便利性等等）也會影響「一個人」的決定，但最終作下決定並執行的人還是那「一個人」。由此可得知，「論文」寫作是相當個人的，其「單一性」的部份非常強烈，不容取代也無法取代。

回頭再看所謂的「格式」，在主觀性為前導的「論文」寫作當中，「格式」似乎就變成一種刻意尋求非主觀的框架與假象，企圖透過一種「標準化」「系統性」

<sup>18</sup> 論文寫作學習網 (<http://ebada.ath.cx/index.jsp>)。

的包裝來掩飾「論文」的主觀性。

本文不會設法去闡述所謂「公平客觀」的重要性，也不會設法讓本文看起來公平客觀。

並非特意要成爲一個少數或特立獨行，而是嘗試套用一般寫作格式之後發現無法順利呈現我想闡述的部份，就好比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同一件衣服，一般「論文」本文部份的寫作格式並不適合我。再者我認爲，一般「論文」本文部份的寫作格式帶有「標準化」之嫌，有企圖與「客觀」連結的意向，與人文社會學科的學術研究面向多變性質不符，並且制式格式缺乏人文社會學科所關照的「人性化」。

因此，目次所陳列的便是我的「論文」架構，可以說是我在「論文」面向上所展現的個性，也是我挑選到最適合的一件衣服。接著，有個性的「論文」是否有其原則呢？打個比方，所謂個性上的原則就好像是「理論」所扮演的角色。

一個人從來不是「一個人」，除了因為人來自社會、取之社會又組成社會，一個人的內在還存有「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他們彼此之間時常進行對話<sup>19</sup>。

面對「論文」，我的「本我」說：幹嘛寫呢？你就是一個惰性很強的人呀，這種努力的事，用不著勉強自己去做吧。

我的「超我」說：這是你該完成的事，不能讓四年的光陰白白浪費，也不能浪費社會資源。

最後說話的「自我」則說：就以它作為一種抗拒主流的方式吧。

我不知道我的個性是什麼，我也不相信我的個性裡頭沒有來自任何人的影響，我只知道面對「論文」時，「自我」說的話聽起來比較順耳。

---

<sup>19</sup> 引用自佛洛伊德的精神學說概念。

#### 四、理論的角色——它的表演位置在哪？

寫作「論文」時不會引用前人的理論時，該怎麼辦？

進研究所之前，對於「論文」一直覺得很有距離感，認為「學術研究」與我何干？等到進入研究所之後，對於撰寫「論文」一事仍覺得有距離，只覺自己無法勝任「透知理論」之事。正式開始寫作之後，仍然覺得我極度想從社會大眾對於「論文」的「專業、專門、專家」感覺當中逃離，這樣的感覺在和本文的協助者談話時更加明顯，雖然能親身察覺植基於社會文化的學術、理論就在談話之間，但有時學術、理論反而造成彼此之間的距離加寬、或者我對於談話內容的誤解，彷彿在我和協助者之間擋了一塊名為「學術」或「理論」的玻璃牆，而我被協助者歸類在一個「專門的領域」當中。非常諷刺的是，對於理論我並不熟稔，或者該說，要到什麼程度才算對於理論熟稔？這很難回答。

基本上引用理論是爲了驗證與烘托自己的研究結果，並且展現對於理論的認知程度與是否融入個人想法。然而對於理論的認知若已然融入個人認知當中的話，其實不需特意在字裡行間明白提示，只因字裡行間都是理論的融入。但對於首次撰寫「論文」的我來說，不去引用理論未免太過「特立獨行」，好像大家都引用，爲什麼我不引用、我不能引用？是我對於理論的理解有困難嗎？或者我根本沒有能力撰寫「論文」？參考他人「論文」時，總是一邊看別人怎麼引用理論，一邊想著這些問題。我也曾經問過指導老師，雖然他也認爲不一定要引用理論，寫出自己的想法就是一種屬於自己的理論，但是，我仍然畏縮、不知如何下筆。

直到某天找到一篇全篇「沒有引用理論」的「論文」<sup>20</sup>時，我才終於有了勇氣踏出步伐。雖然途中我仍然反反覆覆的對自己不引用理論的作法感到質疑，但是有了前人的嘗試和示範，至少我也能夠安心的做自己。

「做自己」總是任性的。不管別人，不理外界，直至頭破血流、傷痕壘壘。但「做自己」也需要勇氣，儘管恐招來剛愎自用又愚昧無知的責難撻伐。

我知道自己的確缺乏嘗試學習引用理論的努力，但這並不代表我未曾去嘗試。只是為何我必須去嘗試？為何我必須努力學會理論、學會引用？

讀者的你覺得：什麼是「理論」呢？

---

<sup>20</sup> 何婉如，迷路的大肚魚-一位女研究生的自我追尋之旅，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5 學年度出版。

## ● 有所寫，有所不寫

「論文」裡頭該寫什麼、不該寫什麼，都跟研究目的有關係。不過以下有一段話，雖然無關乎我的研究目的，但要說與本文無關，似乎又很難釐清。

2006年6月入學到2007年6月期間，沉溺於系所課程與同學之間的交流，沒認真想過「論文」；2007年9月，草擬一份簡潔而不完整的研究計劃並決定「論文」的指導老師之後，到2008年6月期間，埋首於「山」活動計劃的執行之中，沒去修改過研究計劃；2008年9月到12月，逃避「論文」的同時兼任系上代理助教，偶爾參加「論文」討論會；2009年1月，認清要畢業就要寫「論文」的事實，決定要把重心回歸「論文」；2009年2月，擔心因丈夫猝死而大受打擊的H<sup>21</sup>而讓我無心思考「論文」，甚至還有「很多事情都比『論文』來的重要」的體悟而萌生放棄的念頭；2009年3月，麻煩親友代為照顧的愛狗走失，忙著尋狗之餘再度無心思考「論文」；2009年5月，老家養的小狗在我從老家回到台中之後沒多久就猝死，疑似因為我帶去打預防針的獸醫院診療疏失，念及自己可能是間接造成死亡的因素，傷心之餘覺得「論文」根本一點也不重要；2009年6月，在阿川的慫恿及自己的著急趨使之下，進行了「論文」的期中發表，發表之後根本不確定到底接下來要怎麼辦；2009年8月，發現陪伴多年的愛貓有了難治之症，需要龐大醫藥費用，憂心之餘萌生休學找工作賺錢籌醫藥費的念頭；2009年10月與11月，回到家鄉與協助者進行多次訪談交流……。以上，是我寫作過程中面臨的重大事件。

對讀者而言，你可以說這些和本文沒有什麼關係，不過身為作者的我卻覺得有關係，所以我把它寫進來了——這代表，在書寫時作者掌握了相當的權力，同時也展示了自己的權利：詮釋權與言論自由權。

一篇「論文」不可能將一部「個人史」交代詳盡，往往會針對某些面向作集中敘述而設定研究目的與範圍，從採集的資料當中挑選作者覺得有互相關連的部份。撰寫個人史時，作者「寫什麼？不寫什麼？怎麼寫？」的立場與意圖是個人史呈現樣貌的最有力影響，當然受訪者的陳述也具有立場與意圖，甚至導引作者的寫作，然而其意圖終將不若受訪者所陳述的那般完整，在作者的拆解與再現之後成為斷裂的片段。由此可見書寫是一種掌握權力的行動，「內容的鋪陳、角色設定、書寫的語言文字」都是作者可以支配的範圍。因此，在有所寫、有所不寫之間，書寫成為作者向社會展現其權力與權利的最佳場域。然而如何在權力與權利施展之際不侵害、不遮掩、不吞噬受訪者也同樣擁有的詮釋權與隱私權的方法，因著「論文」的作者只能一人的特殊性，共同寫作以互相維護雙方權益的方

<sup>21</sup> 二技時期的同學兼好友。

式無法適用，只能透過不斷與受訪者求證、反覆讓受訪者審視書寫內容的方法來減低其可能性。

是故，本文將透過與協助者的反覆確認來拿捏有所寫、有所不寫的分際，並藉此維護作者與協助者雙方的權益。不過話說回來，「論文」到底要怎麼寫呢？尤其這裡（東海日研所）並沒有「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的相關課程。

完成初稿後，我把中文版電子檔以 e-mail 寄給 M，請 M 閱讀是否有問題，特別是那些有關於她的部份。因為工作忙碌，M 並沒有很快的回覆我。約莫經過半個月左右，M 來電說她看完了，她覺得我把她說的、想說的都寫到了，並沒有任何不當的引用，還說她沒想到我居然能夠記得許多很小的細節部份，讓她覺得很驚訝。

聽到 M 的回覆，一來我很開心她抽空讀完了，二來我也擔心她是否為了給我鼓勵、給我支持所以只說出正面的感受。再者我也開始迷惘：其他在本文之中被我提及的「人們」，是否也該一一的讓他們過目本文，同時徵詢他們的引用同意與確認呢？



● 我的系所課程沒有「論文寫作」與「研究方法」——從文獻當中學習

並非出身於高中大學體系的學生，所以一開始上課時，並沒有察覺也不知道系所課程裡頭沒有「論文寫作／研究方法」這類課程有無影響，後來經由同學的說明才察覺此事的影響性；加上後來開始思考「論文」要寫什麼時，發現自己根本不知道要寫什麼，才知道原來「寫論文」似乎是一門很大的學問。之後只得靠自己以及同學之間互相鑽研討教才勉強有了概念，不過這些粗略的概念仍然無法統整出我的研究方向，為此我開始找尋國內已發表過的期刊論文，想從中學習參照，本以為這是條捷徑，沒想到方向始終不明確的我在猶如繁星的文章當中，如無頭蒼蠅般亂衝亂撞的日子維持了好長一段時間。

然而終於找到能夠學習參照的文章之後，我反而開始感謝系所沒有開設這些課程。

倘若系所開設「論文寫作」相關的課程，或許現在我不是用這樣的方式在「說想說的話」，而是套用一般普遍的格式在寫作，甚至連內容也不是原本我「想說」的；又或者我早就已經放棄「論文」了。

這並非指一般的「論文」格式有問題，只是對我而言並不適合。初期抱著「沒試過怎麼知道不行」的心態，想套用一般的「論文」格式及嚴肅謹慎的口吻寫作，然而幾經嘗試都沒有辦法跳脫平日說話＝口語化的方式寫作，好幾度都想放棄，寫作變得無法持續，或者寫出來的字句不像是我所寫的，反覆的修改也讓我說說的都變成我不想說的。這或許可以歸因於個人的文章造詣問題，只是「想說」的話我堅持必須要說，奈何我不是一個有自信的人，無法一個人朝向自己所想的目標勇往邁進，想用口語化的「說故事」方式寫作「論文」雖然得到指導老師的支持，不過我卻仍舊裹足不前。阿川常說：「你拖拖拉拉的到底怎麼了？怎麼不開始動作呢？」阿川當然知道學生面對「論文」的壓力有多大，然而他卻不知道，我遲遲沒有動作到底是為什麼。其實我並非真的沒有任何動作，只是面對外界我處在一種找不到自己想要呈現的方式而徬徨的狀態。雖然也曾經說服自己不要堅持用自己的說話方式來寫作「論文」，然而說服自己的結果，卻使自己陷入另一個徬徨的漩渦，加上始終找不到先行研究來支撐，心情更加鬱卒到極點。正因為「論文」需要先行研究作為依據（不管是要批判其論點或是支持並延用其論點），所以只能繼續的找下去了。期中發表之後的某一天，在網路上查找「主體性」的相關解說時，居然找到了尋找已久、可以給我信心的依據。在找到的那一刻，持續一年以上陰天的心終於看見一小片藍天。

何粵東的『眾聲喧嘩與獨白：敘說學校生活故事』教我跳脫一般「論文」寫

作格式；張佩涵的『鹹魚復活記—從「勞動階級大學生求學經驗的探究」變形到「我的生命敘說」』教我口語方式也能用來寫作「論文」；何婉如的『迷路的大肚魚—一位女性研究生的自我追尋之旅』讓我明白原來不引用理論真的能成就一篇「論文」；顏如禎的『裁縫師的女兒—以“乖”做為抗拒保護色的小學老師』讓我見識到人文社會學科的「論文」不只是「寫」，還可以加入舞蹈、紀錄片來共同呈現；應用心理研究季刊第 25 期的專題「生命書寫與心理健康」建立我對敘說研究方法的認識基礎。

其實我並沒有「完整的」看完每一篇上述文章，包括寫完初稿之後所看的賴誠斌的博士論文『自我敘說探究與生命轉化—發生在蘆荻社大的學習故事』以及成虹飛老師邀請我參加「論文」敘說分享會時，隨信附上讓我參考的蔡馨儀的碩士論文第九章「豬的漫遊：走過心中所行之路」（出自於『當豬遇見會計：敘說一位會計系學生轉化的歷程』）。他們的文章的確叫我大開眼界，也幫我增添了許多信心，但是我卻不敢一字一句的細細品嚐，深怕不小心，我就陷入他們的生命故事裡，然後在寫作時複製了他們的故事。另外，我總是愈看愈心慌，怕自己寫不出像他們那樣的文章，怕自己文筆不夠好、記得的事情太少，怕自己沒有及時記錄下太多錯過的想法，怕自己一切都已經來不及。

至今，我仍然帶著這份恐慌修改著我的「論文」。

然而那片藍天不是在日文系的上空出現。上述這些因緣際會找到的先行研究都是來自於教育、心理相關系所的期刊論文，就算由上述幾篇論文的關鍵字去延伸查找的其他論文，分類在日文系所之下的文章——零篇。此時的我雖然感到不安，卻也小小慶幸就讀的不是以「語法、文學、商用」其一為中心走向的研究所，而是橫跨多種領域、以多元文化交流為教學主軸的日研所，因此應當能夠接受我這種「跨領域」的作法。

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我終於知道，原來我一直在找的方法在學術領域當中叫作「自我敘說<sup>22</sup>」——口語化叫作「說自己的人生／故事」。

直到即將提出審查的最近，我和同學之間仍然對於「系所有沒有必要開設『論

---

<sup>22</sup> 2010年3月9日在全國碩博士論文網站（<http://etds.ncl.edu.tw/theabs/index.html>）以「自我敘說」作不分欄位搜尋出現 398 筆資料，以「自我敘說」查詢關鍵字欄位出現 125 筆資料，顯示國內在人文社會相關的學術論文方面以「自我敘說」為研究方法者為數不多，但自民國 80 年代迄今則有逐年增加之趨勢。

文寫作／研究方法』課程」有著不同的見解。同學J認為，課程有其必要是因為能夠輔助「論文」寫作者釐清研究方向，不需要像我們這樣繞了好大一圈還找不到或錯過。而且J認為，「論文」不一定會被課程所框限，只要找出方向，相關的事物就會出現在那個方向的道路上。

相較於J，我卻覺得，或許無關乎系所有沒有這堂課，根本的問題其實還是在於我們自己不夠勤奮、不夠付出。如果覺得有其必要性，我們早該奮力爭取，或者不辭辛勞向外求援（例如前去其他系所修習「論文寫作／研究方法」課程），但是，我們終究沒有這麼作。可能因為我們自居是系上的白老鼠，所以我們坐以待斃；可能因為我們沒有遇過這樣的情況，所以我們不知所措、手忙腳亂；可能因為面對的是「學校」「老師」，所以我們不敢放膽爭取。

不過說來說去，我們都沒有上過「論文寫作／研究方法」課程，所以我們討論多次之後仍是各持己見。因此我希望，如果以後有機會我會去修習看看，看看「論文寫作／研究方法」課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再來繼續思考這個話題。

## ● 說自己的人生／故事：我的研究方法

其實我很想省略這一小節。因為我不是知道這個研究方法所以想要以此為方法進行本文寫作，而是在我有一個想像之後才讓我找到「它」的名字，但是如果沒有這個章節的說明，我不知道本文是否可以成為一篇「論文」。

我對「自我敘說—說自己的人生／故事」的最初發想源自於參加系所海外交流學習之旅及「山」活動計劃<sup>23</sup>時多次聽別人訴說他們自己的故事的經歷。海外交流學習之旅當中所遇見的說故事者絕大多數是因為他們有著與現代社會大眾不同的事蹟經驗，所以我們前往造訪聽取他們訴說；「山」活動計劃的說故事者也如上所述，不同的是造訪他們的次數較為頻繁與容易，親近與接近的關係與感覺容易建立與維繫，只是我們彼此雖然都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但是我與他們在語言、文化之間的隔閡卻不見得比與海外說故事者之間存在的少。逐次藉由聽故事的方式我卻感覺到那種隔閡似乎有減少的可能性。那種經驗的傳達與談話雖然不可能百分之百使聽故事者完全了解說故事者的感受，但是這樣的過程它開啓一種「置換性的經驗想像」，意指聽者把自己放進說者所陳述的社會脈絡當中去想像說者所經歷的事件，簡而言之就是運用想像力去想像：如果換成是我，在當下或事後會有什麼樣的感覺。在想像他人經驗與現實的自我之間來回時，我意識到一個問題：我在我的腦海中想像是我的自由，但是如果是要轉述給不在場的第三者的話，那麼轉述他人故事的「我」則成為一個媒介、一個轉換器——如果我是一部機器，一部設定好的機器，轉換過程不會出現問題——但問題是，我不是一部機器，我有思想、我從社會學習或被迫從社會學習，被社會影響也影響社會。從聽故事那刻開始就用想像力去填補自己未曾經歷的空白與跨越時空的不可能，更遑論如實公開呈現他人故事。再者，轉換之後的成品交到讀者手上時，用第三者的立場來閱讀的讀者又會有什麼樣的解讀呢？為此問題我感到不安，然後我開始抗拒在「論文」裡面披露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人的故事。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我發現一個可以解決我的問題、摒除「個人」轉向「公開／公共」過程中所有疑慮的方法——作者轉述他人故事時不能隱身在故事之外。我認為作者身為一個轉換媒介，有其個人立場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若把「轉述機制」架設在「作者自我經驗陳述」的基礎之上，如此一來這便是作者的故事、經驗與生命歷程，與他人的相遇以及曾經聽取他人故事的經驗則內化成為作者生命的一部份，在作者陳述「內化之後的他人故事」時，其個人立場與觀看視角也會明白的「現身」，不再只是一個假裝中立客觀的說書人。所以，我從自己的故事、經驗與生命歷程的敘說出發，從說自己的故事來看他人的故事。

<sup>23</sup> 東海大學日文系研究所必修課程「活動計劃」當中的一個活動計劃。

從「私領域」到「公領域」，在公開的場域向未知的群眾呈現自己的／私人的故事是一項冒險的實踐。雖說「公開」，但因著「文字」的加密，其實只有具備「讀寫能力」之人才能一探究竟，進而生產意義。倘若除去繁複的加密過程，以口述方式或影像方式呈現，將可納入更多未知的群眾，此一實踐也將更加貼近「公開」之意涵。

然而，選擇「公開」的理由為何？藉由「公開」希望獲取什麼呢？「公」與「私」之間又該如何區分？是否能夠清楚區分？

- 來到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在研究所的日子

### 一、從門外走進門內

大哥考上大學時，記得阿爸跟大哥說過類似這樣的話：「陳家子孫目前還沒有人是唸到大學的，你是第一個，要好好唸，知道嗎。」在一旁的我只覺得大哥好厲害。當時的我正要升上國中三年級，雖然已經被每天的小考逼的快要放棄唸書，但對於未來，仍充滿許多嚮往。而且阿爸跟大哥說話時，我看見了阿爸滿是欣慰的神情。和阿爸同輩份的叔伯阿姨比起來，我們家只能勉強算是小康家庭，生活不至於拮据，但是父母節省度日之餘我們小孩也很少要求買玩具。不過關於教育方面的費用，父母總是能給就給。例如才藝班，我（美術）和哥哥（電腦）、姐姐（鋼琴）、弟弟（跆拳道）都各別學了一樣。哥哥學電腦時，父母就買了一台電腦放在家裡讓哥哥也讓家人去使用；姐姐學琴時，父母買了一台中古的直立式鋼琴給姐姐練琴；弟弟學跆拳道時，父母也買了一些練習相關的器材給弟弟；我學水彩畫時，父母就幫我買些水彩顏料和畫筆讓我在家也可以畫畫。另外在學校的教材方面，父母也從來不節省，只要學校聯絡簿上寫說有需要帶的文具器材，我們去學校上課時就是一樣也不會少帶。因此，我知道父母節省生活開銷是爲了能在教育方面給予我們更多的栽培，所以阿爸欣慰的神情，我看的一清二楚。

在我接受義務教育到上高中的階段（1987～1996 年代），普遍流行一種「上大學才能出人頭地」的社會風氣，父母對於小孩的期望都放在能夠「上大學」這個目標上，從國小即將升學至國中之前，就開始把小孩送到補習班學英文、學作文；上了國中以後，補習班的課程從英文、作文增加到數學、物理，把小孩送去補習班衍然成爲一種趨勢，爲了小孩能夠順利考上大學。如果一次考不上，那麼就去重考補習班，衝刺一年之後，隔年再接再厲。在那樣的社會風氣之下，我也沒能抵擋這股趨勢。一開始英文、數學都去了補習班上課，後來因爲國二時已經開始厭倦到補習班上課的日子，所以即使成績再差我都沒去物理補習班，漸漸的到最後，這些科目成績再差我都沒再去補習班了。高中聯考成績雖然不是很好，但也不至於太差，所以也順利考取家鄉唯一一所女子高中，只是沒想到考進前段班的我，後來居然不是因爲抵擋不住考試的壓力與枯燥的生活而萌生離開之意，而是在不滿高中導師不當的教導方式之下，忍無可忍索性休學自行斬斷父母舖設已久的「上大學之路」。

轉而唸五專的我在面臨畢業之際，因爲不確定二技推甄是否能夠順利錄取，所以另外報名幾間大學的插大考試。二技推甄放榜得早，知道順利錄取之後，先前報名的插大考試就不打算去了，但因爲阿爸的一句話，我還是去了。他說：「去考看看能不能讀所大學吧。」聽見他這麼說我才知道，原來他還沒有放棄希望我

能上大學的想法，他還是覺得大學畢業比較好找工作，雖然最終結果我還是去唸了二技。

到了 2000 年左右，社會風氣從流行「上大學」變成「上研究所」或「出國深造」。大哥在大學畢業之後順利的考上研究所，再度讓阿爸倍感欣慰；還是五專生的我，想著「出國深造」的可能性不高，只有待在國內繼續升學的份兒；等到二技快畢業時，「出國夢」仍遺留在我心中，奈何家中經濟狀況實在不允許，不想就此畢業上職場的我爲了趕上唸研究所的風潮，也開始跟著同學去大傳所補習班上課。在 2002 年前後的當時，大眾傳播系所已相當熱門，舉凡記者、主播、導演等等傳播相關工作看起來都很光鮮亮麗，非常吸引人，特別是記者到處採訪搜集新聞的工作特性，讓我想像起來更是新鮮有趣。和人文社會學科的首次接觸與批判意識的啓發也在那次補習的經驗之中，只是過程太短太緊湊，在我還沒來得及消化完畢前，研究所的考試已經結束了。硬著頭皮上戰場的結果雖然全軍覆沒，但是我並非沒有任何獲得。只是懊悔的心情讓我沒有意識到在這過程之中我學到了什麼。

回到家鄉以後，我以爲這輩子再也不會回到校園了，至少不是那麼快，因爲我想存錢去圓我的「留學夢」，所以還沒攢夠錢以前我都沒有再多想。第一份正式的工作讓我再回到台中，沒想到工作兩年後的我，竟如此快速的再次回到了校園。不是錢攢夠了，也不是出國深造去了，而是一個無心插柳的機緣。但這次阿爸居然沒有像以往一樣第一時間支持我，反而試探性的規勸我是不是專心在工作上就好。他說：「女孩子唸這麼高不太好吧？」然後我才知道，原來阿爸對我的期望已經從「上大學<sup>24</sup>」換成「找份好工作，嫁個好人家」了。

可是我捨不得放棄，縱使當時的工作薪資不算少，縱使報考前沒想過會考上，縱使我不認爲我的日文程度之破爛可以讓我撐到畢業，種種原因都讓我沒有辦法放棄。因爲，這裡（東海日研所）的課程看起來實在太有趣、太吸引我了，而且我終於要從被視爲旁門左道的技職體系進入高等教育體系了。在台灣社會，高等教育體系總是排在技職體系之前，儘管技職體系在實作面向比高等教育體系來得有經驗，不過理論鑽研卻總是不若高等教育體系來得精心。在這樣的情況下，實作面向沒什麼表現的我能夠拿到進入研究所的門票，總令我覺得萬分心虛與特別珍惜，只是門票在手，又如何能輕易作罷？

於是，握著門票，我小心翼翼跨過橫在研究所大門前的門檻。

---

<sup>24</sup> 二技畢業與大學畢業是同等學歷。

## 二、不一樣的「日研所」

果不其然，初期踏入時有太多地方讓我感到更加的驚喜。

### (一) 其實不是日研所——多元文化交流研究所

從幾位老師口中得知原本系所是想以「多元文化交流研究所」為名，只是對教育部來說這是一個新的系所名稱，代表要另行成立一個新的系所，不能附掛在原有的日文系之下，教學資源也必須獨立。於是在校方能夠提供的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研究所只能附屬於原有日文系之下，與日文系共用師資與教學資源，而名稱自然就只能是「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

這是本系所的哀愁。校內資源的吝於給予，造成本系所在面對來自校外的評鑑時被迫侷限在現有的系所名稱之下，必須盡其可能的闡明系所表現是合乎教評會所定訂的「標準」以求續存。

如此哀愁，何時能解？

不過並非為了成立研究所才特立獨行，而是日文系學部課程自 2000 年起便不再以傳授日語技能的教學為主（改為重要基礎課程），而是增開獨立思考能力的科目，改以思考、知識、技能為課程的三大主軸。為延續及落實大學部之教育理念<sup>25</sup>以及實現培育溝通交流人才目標，於 2006 年成立碩士班，期待以更宏觀的角度將視野從「台、日」擴展到以「台、日為主軸的東亞地區」與日本相關的研究，俾以更寬闊的歷史觀，培養學生具備以台日關係為主軸的東亞地區跨區域交流（Trans-Regional Interaction）的能力。課程方面規劃「語言接觸」「表象文化交流」「社會溝通」做為培育同學企劃・實踐「跨區域間溝通交流」能力的三個切入角度。以台日之間為主軸，藉基礎共同必修粗窺整體概況，並依同學關注焦點的不同，使其分別修習「台日語言接觸領域」「台日表象文化交流領域」「台日社會溝通領域」課程。然後落實所學，實地規劃・執行「跨區域間溝通交流」活動，出訪各地區人群，親身實際感受，期同學們能具備「敏銳觀察的眼」、「獨立思考的腦」的同時，也能有一顆「善感的心」<sup>26</sup>。

上述的教學理念及課程規劃與其他日研所大不相同，但卻是吸引我就讀的主

<sup>25</sup> 培育學生具備「自省」「獨立批判思考」「發現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以期型塑一位擅長進行「台、日多元文化之溝通與交流」的人才。

<sup>26</sup> 請參照東海大學日本語文學系網站（<http://www2.thu.edu.tw/~japan/>）。



要原因。懷著一顆既興奮又害怕（日語說得不好）的心情開始上課後，漸漸的，害怕的部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闡述自己意見時的勇氣與大方，以及設身處地從他人立場來思考的多重思辨與反思自省。就個人來說，日語逐漸不再只是一個羈絆，而是獲得更多溝通機會的跨界便橋，並且我思考，原來我的日語也能有幫得上忙的時候，例如在兩個人之間搭起溝通的橋樑不是因為我會日語，而是因為我有一顆察覺別人需要便即刻上前幫助的細心，在這樣的細心之下，我的日語才有派上用場的時候。

於是可以說，我在這裡（東海日文）找到了對自己說得一口破爛的日語的另類自信。在系所多元文化溝通與交流的教學主軸之下，我體認到：假若「破爛日語」也能看作是一種語言／文化的話，那便是代表「我」的語言／文化的某一部分。多元文化混雜・融合・排擠・競爭的現代社會當中，語言／文化只有主流／中心與非主流／邊陲之分，沒有所謂「純粹」「正確」「單一」存在的絕對性。這說明在語言層次的「多元文化交流」意指良好的多種語言基礎能為彼此的互動加分，並不意謂著拒絕「破爛日語」「中日夾雜」「只會單一語言」「默不作聲」不准進入溝通與交流的會場，只是進入會場之後能否與他人順利互動則無法給予保證。

以前的我在對面日語時只忙著顧慮自卑，根本沒有想過從「日語」出發去思考跨區域之間的溝通交流問題；以為只要日語說得好，說得像日本人那樣好，就是我在日語方面唯一追求的目標；以為只要日語說得像日本人那樣好，就不會有溝通不良的問題產生。所以我一心只想前往日本留學，以為去了之後我的日語就會跟日本人一樣，說得那麼順暢、沒有腔調，殊不知在「把日語說好」之外，還有更多與日語相關的層面原來這麼值得關注。

從小阿爸打罵我時，我總有一堆話非要冒著被他扣上「頂嘴」罪名的危險，大聲的說出來，因為我不想什麼都沒說的就只是挨揍，因為我有我的想法我有我的理由，不是阿爸說了算。即使阿公阿嬤唸我時，他們若有說錯的地方，我一定會反駁，因為他們說的與我所認知的事實不符，我為何要悶不吭聲的用尊重長輩的假象來掩蓋我的委屈？！而且我從來不認為我是「頂嘴」，因為我不是不尊重長輩，我也不是為了反抗或想脫罪而要無賴，我只是嘗試把我心中的想法說出來而已。現在想想，那些被冠上「頂嘴」罪名的作法其實就是我在嘗試溝通。阿爸雖然還是覺得我青春時期忤逆又叛逆，但現在他覺得孩子當中，和我是最有話聊，就連脾氣不好的阿嬤也曾經和阿爸說過，她覺得在孫子當中，和我最是有話聊。

比起研究日本的文化、文學、歷史、經濟、語言，探索以台、日為中心所延伸關注的東亞「跨區域間溝通交流」問題，比較合乎我個人對於日語相關研究

所的期望，尤其我沒有想到，有一天居然會用日語和韓國人、日裔巴西人、菲律賓人及台灣原住民老人作交流。

在這裡（東海日文）看到的許多風景真的很有趣，有趣到我佇足不想離去，有趣到我飛快的想再看見更多風景。我有點害怕走出這裡之後，再也看不見那些風景，再也沒有機會佇足在風景之前細細思考。又或者，我是該離開這裡了？

## (二) 我和「老師」的距離

從小就和「老師」保持遙遠的距離。幼稚園時代已經想不起來，但國小一年級到二技畢業之間，即使老師很親切或主動接近想要關心我，我對稱為「老師」的人始終帶著一顆畏懼的心。「老師」對我而言，是一個極具威嚴與知識的層級，「老師」說的話不可以違抗、不可逼視，因此一直以來，我在學校都表現的非常乖巧聽話，也非常害怕上課時被老師點名朗讀課文或回答問題，深怕表現不好，「老師」馬上露出嚴厲的眼光或出現在跟前懲罰我。就連高中一年級，老師當著全班面前用不當言詞向我說教時，深覺被嚴重羞辱的我也是忍住怒氣與不甘心，回到家才跟阿爸抱怨，然後消極的用休學來逃離那位老師的不當管教，而非積極的與老師面對面「說清楚講明白」。

研究所錄取之後尚未開學以前，除了害怕自己的日語說的不好以外，另一件事就是頻頻擔心「論文」寫作時必須和「老師」近距離一對一的討論時間。從來不曾主動和「老師」拉近距離的我，根本無法想像和「老師」一起討論「論文」的畫面。沒想到來到這裡之後，除了某些不常見面的老師以外，多數老師我都能夠以輕鬆的心情去面對，聊天吃飯甚至是開老師的玩笑或與老師單獨相處。

學生人數少，相對的與老師接觸的機會便提高，導致我不得不去習慣近距離與老師接觸，但我對老師仍舊是尊敬的，並且覺得「老師」還是威嚴和知識的代言人，只是不再是不可違抗、不可逼視的角色，因為接近老師之後才發現，他們身上的光環其實是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並非他們自己所樹立的。距離縮短之後，能夠更加清晰的觀看老師，也才有機會看到他們也是一般人的身份。

不過無法確知的是，將來若有機會到別間學校不知是否還能和「老師」維持近距離的關係。有時候環境營造出一種氛圍會帶人走入並融入環境，但有時候也是會把人排除在環境之外的。

記得看完初稿的阿川告訴我，說我開頭寫非常的不親切又不引人入勝，要我修改一些走的太快的地方，好讓讀者能夠跟上我的步調。

其實那些我原本想快步走過的地方，就是我不想放慢速度仔細端詳與面對的地方，除了”不想”，也”不打算”去面對（為何不想也不打算？因為知道那些地方「很複雜」，所以只想繞道而行）。但阿川希望我修改，於是莫名奇妙的我被他說服了，然後開始修改，希望讀者可以跟上（原本我並不在乎讀者有沒有跟上）。

為什麼我輕易的就被說服？是因為阿川成為了我的讀者的關係嗎？還是因為阿川是指導老師？或者因為我太信任總是懂得我在說什麼的阿川？好奇怪，他都知道我在說什麼，而我卻時常聽不懂他在說什麼。

### (三) 我的海外交流小史：韓國・日本・菲律賓

#### 1. 韓國經驗

韓國的交流經驗有兩次，兩次間隔約一年。初次的經驗總是令人印象深刻，尤其當時才入學半年，只稍微把自己從「說好日語」的唯一目標當中抽離一些些，也還沒對自己的「破爛日語」建立起信心時，第一次去韓國不僅是讓我印象深刻，更是一種無以言喻的打擊，但是，那個打擊不光只是成立在「語言」之上，主要是成立在「不能理解所謂的交流的意義而感到失望沮喪」之上。

晚餐時間大伙在小酒館熱熱鬧鬧與韓國學生們開懷暢談的情景之中，因為對日語的自卑與個性的放不開，我滿腦子只想逃離那裡，然後，在那情景之中，我又看見有人可以和初次見面的人開懷聊天卻對認識許久的人冷漠已對，霎時間，我對這樣衝突的場景感到納悶：交流是什麼？是一種短暫的虛偽？還是一種即興的表演？為什麼超越了給予身旁的人關懷這件事？這些問題加上自卑與格格不入的感覺，使腦子頓時塞住的我只找到了崩潰這個出口，並且如願的先行逃離現場。回旅館的電車上，崩潰仍然持續，直到當天晚上的感想會，我才明白，原來「交流」有時候是極富政治性的活動。

假如我不參與活動其中，勢必無法了解「交流」的意義，於是之後的海外學習之旅，我便再也不去理會日語說的正不正確的問題，因為第二次的韓國之旅讓我發現，「交流」不是單指口頭上的溝通而已，有很多時候共同進行活動、一起作些什麼也是「交流」所涵蓋的範圍。

第二次到韓國，也是我第二次到「ナヌムの家<sup>27</sup>」，並且在那裡過夜、煮飯以及打掃。相較第一次去參觀史料館與聽阿嬤說故事的經驗，第二次圍著阿嬤聊天、聽阿嬤唱歌、幫阿嬤搥背、打掃公共區域時，那種感覺既親近又真實，感覺和阿嬤之間的距離好近。對我而言，這種「交流」方式是比較能夠融入且溫暖的。

---

<sup>27</sup> 英文名為 House of Sharing，為太平洋戰爭末期被迫成為戰時慰安婦的倖存者（我稱之為「阿嬤」）共同生活的居所並且附設有資料館，成立於 1992 年，1995 年搬往位於大韓民國京畿道廣州市內的現址（資料來源：「ナヌムの家」日文網頁 <http://www.nanum.org/jp/index.html>）。

## 2. 日本・沖繩經驗

進入研究所之前，有過兩次以旅遊為目的的赴日經驗，而且這兩次相隔約有七年。第一次是五專時期與老師同學一起前往日本姐妹校的遊學之旅，雖然行程當中有體驗日本文化的相關學習課程（例如：茶道、花道、劍道、射擊與和服教學），不過旅遊成份居多；第二次則是確定重返校園之前的單純旅遊，從廣島一路北上玩到東京。兩次的旅遊，分別以觀光客的身份前去參觀位於長崎和廣島的原爆紀念館，只記得當時心中除了替因戰爭而犧牲的人感到哀悽之外，別無他想。

進入研究所，接觸到一些探討殖民時代與原爆的相關文章之後，我重整心中對於「日本」的想法。以前多少帶有崇尚的心態，覺得一切與「日本」有關的事物都帶有「高級」的感覺，這樣的心態或許與阿爸和阿公有關，也或者與台灣社會對於日本的崇尚／哈日風氣有關，從老一輩的人懷念日治時代的良好治安，歷經中生代對日本品牌的家電與藥品的愛用，到新生代喜愛日劇、日本明星、日本時尚潮流的狂熱，在這股社會風氣的潛移默化之下，「日本＝高級＝好」的想法成為理所當然。就連在日語方面，也是一樣。想要說的一口流利的日語，為了能夠更像、更接近「日本人」，可以「像日本人一樣」說著日語，然後與「高級」更為接近，如同皇民化時代的台灣人，一心想成為皇民，說日語、遙拜天皇，但終究沒有成為皇民，也沒有被當成皇民對待。於是，對於把日語說好一事不再執著，對「日本」的想像也不再總是「高級」一詞隨侍在側。

進入研究所一年之後，「日本＝高級」的想法逐漸淡化，再次踏上日本時，開始不再為了日本乾淨的街道或呼吸到日本的空氣而感到雀躍萬分。在這樣的轉變背景之下，成就了許多和以往不同視野與感受的岡崎經驗及沖繩經驗。

和岡崎 N 大學<sup>28</sup>的日本學生共同進行的學習之旅當中，我初次遇見課堂文章中所提到的「日裔巴西人」。在保見団地<sup>29</sup>遇見的日裔巴西人以年輕人居多，但是他們彼此之間似乎不認識或未交談過，因此我所參與的小組策劃了一個「交流餐會」，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讓我們與他們以及他們之間能夠有所互動交流。雖然對於當時的談話內容已記憶模糊，不過能夠參與促成那樣盛大的場面（總參加人數約有 30 人），的確讓我對於「交流的意義」有了一番新的體悟——短暫的交流只要有心即可，但交流長度的維持，卻是需要投入更多；長久維持或許會變成一

<sup>28</sup> 位於日本愛知縣，與本系長期進行交流活動的大學。

<sup>29</sup> 位於日本愛知縣豐田市北部的大型住宅區，入住者約有 11000 名，其中約有 3 成居民是被稱之為巴西人或來自其他國家的外國人。這裡有縣營住宅、中高層的國民公寓以及獨棟住宅，其中以縣營住宅的入住者為外國人的比例最高。而附近有許多豐田汽車相關企業，許多人皆是透過人材派遣業者到那些工廠工作。住宅區內劃分了四個自治區域，會依照季節盛大舉辦各種活動。（資料來源：NGO 法人保見之丘國際交流中心網頁 <http://www.homigaoka.jp/>）

種友誼，也或許不了了之，而短暫的交流則猶如曇花一現般，留下驚奇與嘆惜。

活動快要進入尾聲的倒數第三天晚上，脾氣好的我居然遏止不住想生氣的衝動。活動前期，兩校學生不受年紀與語言的差距影響，在調查與共同討論的過程中立即培養出絕佳的革命情感。忙碌的行程之餘，仍然抽空閒聊或玩樂，而我的破爛日語，居然能夠獲得我的小組成員的理解，這讓我非常的吃驚與感動，因為每次的討論我都非常認真的想要讓小組的每位成員聽懂我在說什麼，不管他們是真的懂還是禮貌性裝懂，至少在那樣的場合，我做到了。

溝通暢行無阻的來到當地公開發表會的前一天（倒數第三天），大家為了發表會努力調查、收集資料，並且不斷的討論再討論，到了發表會前一晚，大家似乎都只剩毅力在硬撐，撐住體力、撐住耐性、撐住精神。求好心切之下，我的小組仍在作最後的努力，努力想在發表會上把我們的想法傳達出去，於是我們一次又一次的修改發表內容，一次又一次的有了新的想法，因此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再修改。連日來的疲憊使我的毅力再也無法支撐。那天夜裡的某次討論中，我向小組提了一個新的想法並試圖解釋清楚，而同小組成員（N 大學之學生）在沒有聽懂我的想法卻回說「聽懂了」的情況下，向其他小組陳述了根本不是我所提供的想法。聽見被陳述的內容與我的想法不符之處，我再也壓抑不住情緒，待小組各別討論時，便忍不住的向對方質問：「為什麼聽不懂卻要說聽懂了？」然而對方卻只露出不知該如何回應的表情。後來其他成員在一旁聽了之後提醒我：「對方不是聽不懂妳的日語，而是聽不懂妳所要傳達的想法內涵，因為妳想要說明的內涵太抽象了，對方可能以為自己理解了，沒想到其實你們之間的理解仍有落差。」此時我才發現，原來溝通交流時不是只有在語言層面會產生問題，說法、世代觀念與理解層面上的差距也會使溝通交流產生問題，甚至於是情緒方面的控管。之後我反省我的情緒控管能力不佳，也反省我對於交流的認識原來還是非常粗淺。

另外，雖然是在沖繩，然而我所交流的對象是國內 T 大學<sup>30</sup>日文系的學生。這次的海外學習之旅不如以往有老師的參與指導，全程皆由兩校學生自行排定行程大小事務，包含行前討論與當地感想會。本系與 T 大學日文系有過多次交流活動，而且這次的沖繩之旅也不是我首次參與本系和 T 大學日文系一起合作的活動，但是卻出現一些「特別」的感覺讓我覺得既熟悉又抗拒。那種「特別」的感覺是出現在我發覺對方學生的交流重心偏向「日本人」的時候。在學習日語的前期，我也時常渴望有機會能夠跟「日本人」作交流，甚至是當朋友，所以我多少能夠體會對方不自覺流露出來的微妙「差異」態度，只是如今自己跳脫出那樣的情結之後，則對那樣的「差異」感到非常抗拒。或許這是人之常情，新鮮或罕見的人事物總是易於吸引目光成為焦點，只是我不知道在抗拒之餘我該如何面對這

---

<sup>30</sup> 與本系多次進行交流活動的大學。

樣的「差異」。是接納、憤怒，還是當作沒有看到？當時的我選擇了接納，但內心卻想用「無視於此」來作為逃避面對。

在這當中，我只明白了一點——原來「交流」的目的並不在於弭平「差異」，而是讓人發現更多的「差異」進而思考如何共同去面對「差異」。

坦白說，仔細想來我覺得自己並沒有完全跳脫出對待日本人時有所「特別」感覺與「差異」態度的情結，就像有時仍然無意識會出現「日本＝高級＝好」的想法，雖然我不知道那種情結是要劃分在「親日」還是「哈日」，或者是「戀日」、「媚日」的標籤底下，但肯定不會是在「懷日」的標籤之下<sup>31</sup>。只是在台灣的歷史脈絡下，要意識到自己是否存有那種「特別」感覺與「差異」態度本非易事，更何況是完全跳脫。

或許當時的自己是旁觀者的緣故，又或者自己被劃分在不同於日本人的一個群體裡面，所以才能看得那麼清楚。換個角度來說，看在別人眼中，或許我對待日本人時有所「特別」感覺與「差異」態度的表現是非常過度的也不一定。

---

<sup>31</sup> 林泉忠(2010): <哈日、親日、戀日? 「邊陲東亞」的「日本情結」>。《思想》，第14期，139-159。



### 3. 菲律賓經驗

在菲律賓，日語派不上什麼用場，可是英語早就生鏽了，怎麼辦？要如何溝通？其實沒怎麼辦，還是可以溝通的。

第一次與菲律賓人交談，是在台灣，而且我是用台語<sup>32</sup>和對方說話（雖然阿爸老是要我跟她說英語），因為對方是我的表嫂——也就是所謂的「外籍配偶」——她來自菲律賓，大學畢業，大阿姨及表哥一家人都和她說台語，所以很快的，她的台語說得比我還要好。

第二次與菲律賓人交談，還是在台灣，不過這次就得用英語和對方說話了（雖然他也會說中文，但是真的只會一點點），因為對方是我的同事——他不是所謂的「外籍勞工」，因為他不靠勞力賺取薪資，他是建築土木工程師——他來自菲律賓，研究所畢業，去過很多國家，是標準的海外派遣工作者。

第三次和菲律賓人交談，仍然在台灣，但我忘了是用英語還是用中文或台語和對方說話了，因為對方在台灣生活很久了——他是天主教教會的神父——他來自菲律賓，他幫助很多在台灣菲律賓勞工解決困難並且帶給他們一個安穩的庇護所，只是去年他返回菲律賓，不能再幫助繼續留在台灣的菲律賓勞工了。

第四次和菲律賓人交談，又是在台灣，我是用眼神和肢體動作和對方說話，因為對方和我都非常的害羞（大部份是我比較害羞）——他們是經常出入上述提到的神父所開設的庇護所的菲律賓勞工——他們來自菲律賓，有著什麼家人、什麼學歷，我都不清楚，因為我實在是太害羞了。不過，只是眼神和肢體語言的交流，我們仍然一同進行了一些事，就是一起吃飯，雖然席間沒有言語，但卻有些微的互動在進行。

第五次、第六次……忘記是第幾次了，不過這次真的就是在菲律賓當地。第一次到菲律賓參加學習之旅時與對方認識的，但出乎意料是用日語和對方說話——她是日文系畢業的學生，現在在日本工作。

還有一次去到菲律賓探視老師菲律賓友人的家人時，我用英語、用僅會的幾句菲律賓語，配合著眼神與比手劃腳（包括跳舞）和他們進行數天的交流。

---

<sup>32</sup> 從學術立場來說，經常被使用的正式名稱多以「閩南語」、「河洛語」、「福佬語」等等為主；從宣揚台灣主權的立場來說常被稱之為「台灣話」，但從台灣各族群的各別主權來看，「台灣話」一詞不應只有指稱某一特定語言。上述眾多立場卻無一能代表筆者「我」的立場，因此在本文便從筆者自身角度提出成長歷程當中最常用以指稱之字詞的立場將之稱為「台語」。

菲律賓的交流經驗對我來說雖然不若韓國與日本的交流經驗令我情緒起伏，然而這樣淺淺的、平順的感覺卻仍舊深刻難以忘懷。

#### (四) 我的原住民部落交流小史：史努櫻<sup>33</sup>·中原<sup>34</sup>

##### 1. 史努櫻經驗

這個經驗皆起始於系所課程——台日多元文化交流總論。一年級上學期剛開學，老師們立即籌辦首次校外合宿活動。去到那裡的路途我並不陌生，台中—清境或台中—廬山的延途風景是消解我工作壓力的最好良方，只是進入部落、和部落的原住民有所互動，是進入研究所之後的事。

本文協助者 M 是原住民，但並非在部落生長。她曾說過，部落原住民和非部落原住民之間其實是有差異的。對我而言，在遇到部落原住民之前，我不知道 M 所謂的落差是指什麼。來到史努櫻，我開始感受到 M 所謂的「差異」——在史努櫻的大家比起 M 更接近我想像的原住民形象：說中文時帶著濃濃的腔調、很愛開玩笑、晚飯後在家門口總會三五成群、小孩之間會語帶中文夾雜原住民語互相打鬧、父母的職業絕大多數是務農或工人——但這些同樣的也很符合我小時候對住家附近的原住民鄰居所存有的印象。於是我才開始意識到，是 M 與眾（其他我所認識的原住民）不同。

史努櫻經驗開啓我對原住民議題的關注，並提醒我回頭重新思考面對原住民時自己是以何種立場及想法在與原住民進行交流。另外，在史努櫻聽故事的經驗帶領我開始逐步回想起自己的故事，進而促成本文的寫作動機。

##### 2. 中原經驗

雖然是史努櫻經驗延伸而來，但是與當地居民有所交流卻起始於一個本系與日本 N 大學師生在台灣的協同學習活動。活動中我們協助部落教會探訪當地居民，並且繪製簡易的部落地圖。探訪過程雖然短暫，不過在分組分區進行之下，大家都帶回很多有趣的交流經驗與故事。而對我來說最特別的，則是與教會青少年的互動交流。

---

<sup>33</sup> 為現今南投縣仁愛鄉春陽部落，居民以原住民賽德克族為主。「史努櫻」為賽德克族語 *Snuwil* 之中文音譯，意指「櫻花」，族人用於指稱春陽部落。我對此部落最早的接觸便始自於「史努櫻（*Snuwil*）」此一名稱。

<sup>34</sup> 為現今南投縣國姓鄉中原部落，居民以原住民賽德克族為主，中原為國民政府所賦予之名稱。

史努櫻的教會也有很多青少年，但是不知為何，每次去我都只有和固定一兩位寒暄閒聊，和別的青少年之間，總有說不出的距離感。反觀中原的教會青少年雖然人數不多，但是每次我和他們相見時，總會像認識多年的鄰居般一一問候談天。照理說，我出入史努櫻的次數比較多，應當是與史努櫻青少年較為熟絡。我個性上的羞赧與被動或許是原因，但是在中原部落時卻沒因此形成阻撓；還是因為相較於史努櫻青少年的為數眾多，在人數明顯略為稀少的中原部落青少年當中，我難以沉沒／沉默於人群之中？從籌備協同學習活動以來，每次前往中原部落，心中總是毫無負擔，不像去史努櫻之前，總是牽掛著熟識的人是否不在場而感到沒有安全感。

## (五)小結

從門外走進門內，我開始能夠近距離和「老師」相處，我珍惜人與人之間相處的作法與態度開始改變，我看事情的角度開始改變，我思考事情的基準開始改變……然後我驚訝的發現，從小頻繁與原住民（複數的單一個體）接觸的我，以為自己對原住民（複數的族群）很了解，以為自己對原住民（複數的族群與單一個體）沒有刻板印象，然而因著系所課程開始思考原住民（複數的族群）相關議題的我，其實內心裡，原來一直存在著對於原住民（複數的族群與單一個體）的刻板印象，而且既深刻又難以抹滅，只是我從來沒有察覺／意識到……。

什麼是交流的「契機」與「阻礙」？是國籍、是身份、還是語言？

我的答案是：打開的心與封閉的心。

你的答案呢？

## ● 爲什麼是「原住民」？

爲什麼是「原住民」？

該怎麼說才好呢……就從頭說起吧。

坦白說參加入學考時甚至是入學後的兩年內(碩一忙著修完所有有興趣的課程學分，碩二則一頭栽進活動計劃而且再累都覺得津津有味)，我都未曾決定好要以「什麼」作爲自己的「論文」題目，或者更直接一點來說，我根本不想寫「論文」。現在想起來，發現那時會這麼想的原因是我對於「論文」一事的認知只停留在「不知道要以什麼爲題目」的單純階段而已。即使後來認清「真的要寫『論文』才能畢業」的事實之後，「不知道要研究什麼」仍然使我與「論文」之間距離遙遠。我想，那時是被自己對「論文」的刻板印象所侷限，以爲「論文」是要博大精深、是要理論橫陳的、是要引用無數的…然後在類似這樣一個自以爲是的框架之下，假如我努力拼命的把框架內部塞滿，似乎就可以產生一篇對社會有所貢獻的「論文」了。只是，被自己的想法框住的我，根本無法在框框裡頭找到自己想要的。

碩三開始，還是繼續參加活動計劃，雖然已無學分，不過仍然興致昂然。同學之間也曾笑說：該不會是要藉由活動計劃來躲避「論文」吧？我心想：那倒好，活動計劃似乎比「論文」有趣多了…雖然我沒寫過「論文」。進入碩三，除了「論文」，所有的學分都修完了，然後呢？「『論文』，其實我也可以不需要爲了它這麼煩惱吧？或者我根本就沒在煩惱？」在腦海中自問自答的我時常想起一件事：我並不是爲了文憑來唸研究所的。找工作不一定跟讀什麼系所有直接的關係，有碩士文憑亦不代表容易就業，特別是對現階段的我來說，「工作賺錢維生」的重要性真的排名很後面，並非視金錢如糞土，畢竟我仍然需要「錢」才能唸書吃飯過活；我也不是對自己的人生沒有規劃，只是認爲在「賺錢」之前還有更多重要的事；當然，也是因爲目前還有「錢」可以吃喝過活，所以才能夠去做那些我覺得比「賺錢」還重要的事；此外，加上我有零星打工以及工作兩年的經驗，對於「賺錢」一事並不特別感到熱衷等等種種原因使我覺得文憑並不是重要的。那麼，有上述想法的我有必要爲了拿到文憑而繼續待在學校自我折磨嗎？這個問題，我問過自己好幾遍。「唉呀，反正現在畢業工作也不好找嘛，現在景氣不好，繼續待在學校也不錯呀！新聞都在說，畢業即失業，好多博士、碩士都找不到工作耶！」對於上述說法，我總忍不住想要反駁說：我又不是爲了更高的薪水而來唸書的！但是，當真反駁了，對方是否認同我的說法也無從得知，畢竟在我反駁的當下，我根本還沒有畢業的確是事實。再者，目前台灣社會偏向以文憑論斷個人能力的情況下，「我」這個人——單一個體的想法如何，根本不被重視也無法輕易改變這樣的社會觀感結構。然而這並不代表，「我」這個單一個體不重要。

於是對於「論文」我有了不同以往的想法。

單一個體的獨白總是被大時代的喧囂聲所遮蓋，但生活於大時代底下的個體獨白除了是「自言自語」，其實也是試圖和大時代的喧囂聲進行對抗和溝通的「對話」，就如同我想將我的獨白以「論文」的型式來和這個社會作對話一樣。如果要把「論文」當作是一種研究結果的呈現途徑之一，我想這個對待「論文」的方式並不適合我（「研究結果」也是一直框限住我的煩惱——無法預設結果的問題就不能促成一篇「論文」），因為我不是一個博大精深的人，寫不出理論橫陳的文句，更不會引經據典，我只知道這個社會有太多值得去懷疑去探究、特別是一些被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人事物，而回到校園開啓我反身檢視那些「理所當然」的契機。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最視為理所當然的，就是觀看台灣原住民族的視線。

甫進入研究所，因著課程的引導，促使我逐步與位於南投縣仁愛鄉的原住民部落有所接觸。回想最初，生長在東部的我抱著自認為「與原住民很熟」的態度前往，接觸後才發現，在社會文化方面，我根本不了解何謂「原住民」，也不了解多年來台灣社會的教育究竟放置了多少差異與距離在我與原住民之間？然後我思考，最初抱著「自認與原住民很熟」的驕傲自大到底打從哪兒來的？是根據什麼我會這麼認為？就算從小生長環境周圍不乏原住民朋友，但是我真正了解什麼是原住民嗎？我知道「原住民」這三個字、這一個標籤在台灣社會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嗎？我未曾思考懷疑。即便開始思考之後，對於上述問題，我卻找不到答案。姑且不論台灣社會看待「原住民」的視線為何，我自己如何看待「原住民」？我說不出一個確切的答案，至少連一個「暫時確切」的答案都無法提出或者不敢提出，那麼我如何可以自大的認為「我與原住民很熟」？不論「我與原住民很熟」所指涉的原住民是象徵一個族群還是個人，終究我必須檢視自身如何能夠懷抱著那樣毫無根據而空有熱情與自信的想法。

曾有老師跟我提過，在台灣社會之中，原住民族堪稱弱勢族群當中的「明星」，許多社會議題與研究專書甚至是政策制度方面，處處都可看見原住民族的影子與關注原住民族的眼神與愛心；然而相對於原住民族的「明星」身份，卻有更多弱勢族群及團體未接收到同等級的關懷與協助，是弱勢中的弱勢，身影之渺小程度簡直如同蟬翼般單薄到就像透明一樣，很難被發現甚或是很難成為被關懷協助的對象。例如：以結婚為目的移民來台的女性（所謂「外籍配偶」）或是偏遠且資源貧乏地區的孩童教育（這是一個相對性的比喻說法，雖然「外籍配偶」的相關研究以數量來說並不算少<sup>35</sup>）。老師建議我，何不妨以上述兩例為研究的主題及對象？我同意老師的「原住民族是台灣社會弱勢族群之中的『明星』」說法，從學術論文<sup>36</sup>和相關專書<sup>37</sup>以及相關政府機關的設置<sup>38</sup>來看，原住民族相對其

<sup>35</sup> 2010年3月26日以「外籍配偶」為關鍵字檢索國內碩博士論文網站，結果出現379筆資料。

<sup>36</sup> 2010年3月26日以「原住民」為關鍵字檢索國內碩博士論文網站，結果出現1515筆資料。

他弱勢族群確實是比較聚焦的一顆「明星」。然而對我而言，在「明星」的光環之下，原住民族近幾年來匯聚的光線是否也刺眼的讓別人看不見他們在光線之外的黑暗處究竟失去了多少？他們在失去與獲得之間是否曾經得到過一瞬間的平衡？幾世紀以來的被殖民經驗是否曾經沖淡他們所遭受到的不平等？這些我無法如同其他學者或研究者能夠提出什麼更加精闢的理論剖析或獨到見解，只能說我並非因為原住民族是弱勢族群所以將主題和對象設定為原住民。

雖然在系所的課程當中，我逐漸意識到所謂的「(對他人的)偏見」與「(對他人的)壓迫」是無所不在的，即使格外小心注意，也會反思並意識到「格外小心注意」本身也是一種帶著「偏見」與「壓迫」的行為，但是卻不會為了不使自己帶著「偏見」與「壓迫」看待人事物而躲在象牙塔裡，反而更加珍惜與「人」接觸的機會，希望在與自己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接觸時，我所攜帶的「偏見」與「壓迫」會逐漸一件一件的卸下。雖然偏見與壓迫在和不同族群的人事物接觸之前或接觸的當下可能會同時增加或者轉化為不同層次、不同層面的偏見與壓迫，再者全然消除對他人的偏見與壓迫是絕非可能，然而我盼望自己能夠作到的是隨時隨地意識到自己是帶著偏見與壓迫的。

所以當我發現自己無意識認為從小在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地區長大、又有認識多年的原住民朋友的自己應該很了解台灣原住民族的自以為是心態之後，我認為在「研究他人」之前應該先「研究自己」——面對自身對於原住民族所帶有的偏見與壓迫。偏見與壓迫僅僅只是來自於生長環境的不同或是族群的不同如此單純的歸究說法就可涵蓋嗎？當然不可否認的，的確生長環境與族群的不同會帶來偏見與壓迫，然而時空轉換人事異非，相同的「偏見」與「壓迫」情形卻仍舊持續並且長期存在著，如此一來是否仍然可以用生長環境與族群不同這樣一貫又單純的說法來解釋這樣的狀況呢？特別是大環境底下的小人物們，他們的容貌以及他們的聲音總是被歷史——所謂官方撰寫建構的「國家歷史」所淹沒遮蓋乃致於消聲匿跡，就好像是說：有這麼一群人存在，但這群人的每張臉卻沒有五官與頭髮。

而原住民族的歷史在官方撰寫建構的「國家歷史」裡頭則恰恰相反。原住民族並非因為他們是社會的弱勢族群所以完全被淹沒與消聲匿跡，反而「國家歷史」會告訴你：有這麼一群人存在，而且他們這群人的長相五官是再清楚不過的，每張臉都一模一樣或是固定幾種長相，就連髮型也是。於是原住民族的存在在台灣社會一直都非常顯眼，顯眼到你幾乎不會察覺也未曾注意過他們「真正的」長相

<sup>37</sup> 根據南華大學出版與文化事業管理研究所陳雨嵐（2008）的碩士論文「台灣原住民圖書出版歷程之研究（1980至2007年）」指出，1980年至2007年共有410本原住民專書出版，作者族群身份橫跨多個族群（原住民族、漢族等）與地區（台灣、日本、中國、俄羅斯、美國、比利時等）。

<sup>38</sup> 1996年12月設置原住民族委員會專責統籌規劃原住民事務。



爲何（或者你根本不在乎他們「真正的」長相爲何）；顯眼到你幾乎想都不用想你就可以說出你對他們的認識（或者你根本沒有想要去認識他們）；顯眼到你根本沒有和原住民接觸過但你卻可以說出你腦海中對於他們的想像是什麼（或者你根本未曾想過要和他們有所接觸，甚至這些問題從來沒有出現在你的腦海裡）。

官方撰寫的「國家歷史」提醒我們在台灣有這麼一群「長相清晰」的族群存在，包括族群名稱、分佈地點、傳統文物、風俗民情等等這些外在的形容之外，對於他們是一無所知。對於未知的人事物，人類擅於編纂一些說法來讓自己心安，久而久之那些說法演變成一種對特定對象的偏見；而同樣的事從政府的角度去編纂一些說法時，顯然便是在進行某些極具政治性的偏見散佈與壓迫執行了。另外，從周遭（漢族）朋友未曾覺得原住民議題有何關注之必要此點來看，我開始思考是否因爲原住民族在台灣社會的存在「太過顯著、太過理所當然」所導致，以致於我們根本不會質疑教科書及主流媒體所刻畫的原住民形象？以致於我們全然忽視身爲漢族的我們對於原住民族所造成的各種層面的偏見與壓迫？即使在 1980 年代原住民族運動激烈展開以來至今，上述「理所當然到未曾質疑」、甚至是「理所當然到不需質疑」的心態仍然是大眾（甚至包括原住民本身）對於來自官方歷史及主流媒體所刻畫呈現的原住民族形象所抱持的認知態度。

再回頭看看身在大眾裡頭的自己，同樣也抱持著「理所當然到未曾／不需質疑」的認知態度在看待「自以爲熟悉」的原住民、甚至是朋友（原住民）。最初意識到這樣的自己的存在時，根本不敢面對也不承認，甚至覺得可笑到近乎尷尬。不敢面對，不是因爲不知道該用什麼樣子去面對，而是太過習以爲常，無法想像卸下以後將會變得如何。再者，我何必自大眾當中抽離？跟隨大眾，不是比較有安全感嗎？然而，當我意識到長久以來的「理所當然」具備偏見與帶來壓迫時，繼續擠身於大眾之中開始令我感到不安。這種不安就好比是 Paulo Freire<sup>39</sup>在『受壓迫者教育學』一書當中提到的：

當壓迫者發現自己竟是一個壓迫者時，他也許會產生相當的苦悶，但是這種苦悶並不必然會使他與受壓迫者「團結」在一起<sup>40</sup>。

只是我並無法自大眾完全抽離，那麼，我要如何化解這種不安／苦悶？苦思之後我認爲應該先著手了解自己在什麼情況之下可能成爲壓迫者，具體方式可藉由書寫自我來進行釐清與反思，而「論文寫作」則是一個絕佳的機會，並可視其爲一個對話的場域，一個可以進行拆解的場域，或者是一個公共性的體現過程（胡

<sup>39</sup> 巴西著名的成人教育學者及教育工作者，也是西方二十世紀下半期以來最重要的教育學者之一。近年來，他的教育思想與理念隨著 critical pedagogy（批判教育學）在西方的日漸盛行而愈發受到重視。

<sup>40</sup> 方永泉（譯）（2003）（保羅·弗雷勒 Paulo Freire 著）：《受壓迫者教育學》。台北：巨流。80:8-9。

紹嘉，2005)。它是一個開放的、靜態的、緩慢的空間，我在裡面和自我對話，同時也與讀者對話，更與社會對話；它也是一個展示（空間／物），播放／放置我拆解自我的過程與拆解下來的每個部份，同時也播放／放置我拆解本文協助者的過程與每個部份，以及播放／放置我拆解社會結構的過程與每個部份。

簡而言之，就是一場透過與自我及他人（本文協助者）的對話，企圖逐步拆解在社會一個人的關係當中，我對台灣原住民族的「理所當然」視線是如何被建構／建構的，再藉由書寫重組／重構／再現社會建構下的「理所當然」所化約的個體（我及本文協助者），同時提供他人（讀者）及社會一個開放的詮釋性對話展演。藉由這場展演，我希望我的不安／苦悶能夠找到出口。

在台灣社會裡，說出身為漢人的苦悶，有點像是在無病呻吟。不過就算是無病呻吟，我仍然要說。因為除了說，我不知道還能怎麼去處理我的苦悶。我不懂得被漢人壓迫的原住民的苦悶，我想，原住民們也不會知道原來身為漢人的我也有許多苦悶。

透過互相了解對方的苦悶，有一天，也許我們能互為彼此的苦悶找到解套的方法。

## ● 從「山」活動計劃開始

活動計劃（project）是必修課程，在幾個活動計劃之中我選擇參加「山」活動計劃的原因起始於進入系所後的第一次合宿活動。雖然從未去過合宿活動地點（史努櫻部落），但是那裡的景象與在家鄉時我偶爾會經過的原住民部落很相似，因此我帶著一股對原住民部落「熟悉卻又陌生」的感覺加入了「山」活動計劃，想要揭開我所熟悉的部落外在景象，一探其內在層面的文化與生活，然而沒想到，獲得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發現竟是回到我自己身上。

### 一、她說我是「平地人」——我說：我是誰？

某天剛到史努櫻部落教會不久，迎面走來幾位面熟但沒交談過的小朋友，一開始小朋友們不敢太靠近我，在旁邊觀察了一會兒才走近，然後開口就問我說：「你是日本人嗎？」我心想，大概是因為我和老師同學之間會用日語交談，所以小朋友才會覺得我是日本人吧。我搖搖頭。然後其中一位小朋友再問：「那你什麼人？」嗯，這個問題嘛，我要說什麼人好呢？課堂上有討論過關於「自我認同」的問題，並且討論出來的最終結果是「自我認同」的構成元素並非單一，而是由複雜的多種認同所構成的，所以我可以回答說我是台灣人也是台中人更是台東人或者地球人，只是小朋友聽得懂我（想太多之後）所要表達的意思嗎？小朋友只是想要一個簡單的答案吧，我看還是選一個答案講就好，不要把事情弄的太複雜……正當我還在猶豫要講哪一個答案時，有一位小女孩已經迫不及待的幫我回答了。她說：「妳是平地人對不對？」呃？「平地人」？我是「平地人」？不等我回答，其他小朋友們像是找到了答案似的也跟著說：「妳是平地人、妳是平地人啦～」然後就鳥獸散般的邊笑邊跑直到離開我的視線。

平地人？我是「平地人」？在我的認同裡頭怎麼從來就沒有出現過這一個區塊？我頭一次被別人這麼指稱耶！霎時我有點反應不過來，只能略微呆愣的看著小朋友遠去。

「平地人」相對於「山地人」，「漢人」相對於「原住民」。我對於「漢人（等同指稱漢族）」一詞的最初認識是從歷史故事書及教科書習得，所謂「中國五大族群—漢滿蒙回藏」當中最大的一個族群，因此「漢人」一詞對我而言具有「漢人—中國」的連帶關係，換句話說，我認為「漢人」一詞有指涉「中國」「中國人」的意涵。雖然國編版教科書（國文、社會、歷史、地理等）不斷提及台灣—

中國關係提醒著我是「中國人」，應該時時抱著反攻大陸救同胞的理念思想，然而這樣的理念思想卻與我生長環境的現實生活大不連貫。從土地的認同層面來說，教科書提到的「祖國中國」對我而言只存在於想像當中，沒有任何實質的依附情感，我也未曾踏上過中國的土地，因此我無法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而帶有「中國」「中國人」意涵的「漢人」也因此不常出現在我的自我認同當中，偶爾的閃現則是因為我略微知悉漢人移墾台灣的片斷歷史，只是對於那段歷史的認同終究無法勝過我對出生地的認同程度。開始頻繁前往部落以及參與原住民相關議題活動之後，被直接指稱為「漢人」的機率提高，連帶影響我對漢人移墾台灣的歷史認同也有所異動——從「漢人移墾台灣」變成「漢人移墾台灣之後，爲了自身利益欺壓原住民、奪取原住民資源，並污名化其族群與文化以鞏固自身在台灣存在的正當性」，並且從「歷史—過去」的層面持續延伸到「歷史—過去—現在」的層面。初期的我曾想要否認與抗議這樣的歷史認同，並且認爲那樣的情況僅止於「歷史—過去」，因爲個體的漢人—我並沒有在日常生活上實際傷害過任何一位原住民，但是隨著日漸增加的接觸經驗與議題關注，我開始意識到作爲群體—漢人的一份子，移墾初期漢人對原住民的種種略奪與壓迫到現在仍舊持續進行著，於是我的「漢人認同」在有所意識的過程當中逐漸的從「漢人—中國」轉換爲「漢人—台灣」，到現在的「漢人—壓迫者」。

對於「平地人」一詞，我既沒學過也從未出現在我的認同當中。不是沒有聽說過，只是我對於「平地人」一詞的認知是停留在「住在平地的人」的階段，並且我也從來沒有被人家這樣指稱過。只是當小朋友對著我說「妳是平地人」時，我似乎聞到一股「訕笑」的氣味在小朋友們的笑鬧之間，此時我才開始懷疑我所認知的「平地人」意涵是否太過狹隘？是否與小朋友所認知的「平地人」意涵有所不同？小朋友認知的「平地人」意涵又是什麼？我試著揣摩小朋友的立場與心理，想從中多少獲得一些可能是答案的線索，便把我和小朋友的角色作了對調。突然，一種熟悉的感覺浮現，一個場景很遠但不陌生的畫面愈來愈清晰：那是我小時候對「山地人」「番仔」<sup>41</sup>的記憶——記憶中，大人們提到「山地人」「番仔」時，都略微帶著鄙視與不悅的神情，而我不確定自己是否也帶著鄙視與不悅的原因是我有一位朋友是所謂的「山地人」「番仔」，但我常告訴大人們：我的朋友的家庭背景和其他「山地人」「番仔」的家庭背景不一樣，而且朋友不住在山地，就住在離家不遠的地方而已。只是現在的我可以確定，以前的自己也是帶著鄙視與不悅看向原住民——但其中不包括我的朋友與其家人——我用「家庭背景」來衡量我的朋友（父母學歷皆在高中以上，不喝酒，不吃檳榔，不說原住民語言，說中文沒有腔調，家庭經濟狀況比我家好），把我的朋友與其家人從我所認定的原住民族群（父母學歷低，嗜酒、檳榔，說原住民語，說中文時帶有腔調，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當中隔離開來，另外歸類在一個特殊的族群類別裡，而他們原本所屬於的原住民族群則與我何干般的被我遠遠拋在腦後，如此我才能義正辭嚴的

<sup>41</sup> 「山地人」爲中文，「番仔」爲台語。

說出「我的朋友和其他原住民不一樣」這樣暗藏鄙棄原住民族群涵意的話。

接觸部落之後，我的自我認同有所改變，我也看見自己用以衡量原住民的價值觀內涵原來只有來自漢人的主觀立場與文化思維。倘若從原住民的角度來看，我想應該被稱作「番仔」的是移墾台灣的漢人，因為漢人才是來自「番邦的人」，是道道地地的「番仔」，而原住民小朋友若真帶著訕笑稱呼我為「平地人」的話，那訕笑的程度絕對不及漢人將他們污名化為「山地人」「番仔」的千萬分之一。

我是誰？又是別人眼中的誰？我是否成為了別人眼中的那個誰了？

我想弄清楚，但一切沒有這麼簡單。

## 二、我所習得的—用以評判「原住民」—價值觀

我用以評判原住民「家庭背景（父母學歷低，嗜酒、檳榔，說原住民語，說中文時帶有腔調，家庭經濟狀況不佳等）」的基準從何而來？原住民又是透過何種方式被污名化？在我自身的經歷當中，能夠找到「具體證據」說明的便是「教科書」。另外，試著藉由整理大眾媒體在原住民相關報導上的呈現方法，輔以說明我的成長背景當中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看法」與「認知」為何。

### （一）教科書：官方塑造之價值觀

搜集了我曾使用的國民教育教材（國小六年—1986年8月～1992年6月、國中三年—1992年8月～1995年6月<sup>42</sup>）以「具體」呈現官方所型塑的原住民形象。前往國立編譯館查找的過程當中發現，1988年之後的教材內容提到原住民（當時皆是使用「山胞」一詞）的比例下降，特別是有關「吳鳳」的內容都予以刪除<sup>43</sup>，只是提及原住民的內容都不斷重覆型塑一些「負面」的形象。在此列舉部份我曾使用的教材內容以說明當時官方所塑造的「負面」原住民形象（請參照附錄一）。

國小二年級上學期的社會課本（第三冊鄉土與風俗，民國76年8月修訂再版）的標題肆（鄉賢故事）當中有兩個故事提及了原住民，一則為「改革壞風俗」，另一則為「反抗強暴」。在「改革壞風俗」的標題及課文內容（P65：過去，山地同胞有用人頭祭神的壞風俗）皆提及原住民有「壞」的風俗，言下之意便具有「應當革除」的意味；「反抗強暴」一文當中，除了把原住民塑造成「被毒打、被搶奪」的卑下弱勢族群之外，又用「把日本人殺死」的字句回應前面的「被（日本人）毒打、被（日本人）搶奪（財物）」，形成一種原住民雖然弱勢，但報仇起來卻「兇殘可怕」的形象（四年級上學期的社會課本當中亦以「日本人藉口琉球人在現在的恆春牡丹鄉被山胞所殺」來型塑原住民兇殘可怕的形象）。

此外，強調「傳統文化（射箭、歌舞、文物）」「生活艱苦、飲酒惡習需改善」並且提及「教育山胞、安撫山胞」等視原住民為「落後」「未開化」族群的課文

<sup>42</sup> 雖然自1989年起國立編譯館已開始開放部份教科書（國中藝能和活動科目審定版）的編輯於民間出版社，不過此時期我所使用的仍是國立編譯館統一出版的教科書（至2002年「統編版」教科書才正式走入歷史）。

<sup>43</sup> 1988年在原住民族團體的抗議之下，教育部宣布將吳鳳故事由課本中刪除，吳鳳神話自此從教科書中退場。

則有國小三年級上學期的國語課本第十三課「布農族的神箭手」、三年級下學期的社會課本標題參之四「山地社區的問題<sup>44</sup>」、四年級上學期的社會課本標題參之二「沈葆楨功在臺灣」與參之三「劉銘傳治臺新政」。

而照片與照片說明的使用也著重在原住民的「傳統服飾」「祭典儀式」方面，並且與「觀光休閒」結合之意味濃厚，例如四年級下學期的社會課本標題貳之四「豐富的休閒生活」當中擺放了一張名為「東西橫貫公路」的照片，照片內容則有兩位身著阿美族服飾的女子站立在東西橫貫公路牌坊之前合影；另外在參之四「勤奮富裕的日子」當中則擺放了一張原住民豐年祭的照片。五年級上學期的社會課本則有一張「中華民族各宗族分布圖」，上面標示位於台灣位置的是臺灣山胞，所採取的照片也是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

國中之後，有關於原住民的課文內容只出現在一年級下學期的地理課本當中。在第一課「南部地區<sup>45</sup>」的課文內容當中於「族系很多，人口外移」標題之下短短的提到「……由於地形崎嶇阻隔，很多族系，如苗、徭、黎、傣、僮、**臺灣山胞等，仍然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之外，其餘皆以照片及照片說明文的方式提及原住民，而照片主題亦全部以著傳統服飾的原住民或祭典照片為主，照片說明文則附帶說明各族群服飾與文化特色。此外還有一張「臺灣山胞分布圖」用以說明原住民各族群的分布位置（當時原住民還只有九族）。

綜合上述課文內容可以發現，原住民在官方從漢人文化思維立場出發的塑造之下所呈現的是一個「兇殘」「需教育」「生活艱苦」「惡習難改」「生活形態傳統（服飾、祭典、打獵、文物）」的「落後」「卑下」「弱勢」形象，以漢人文化價值觀為標準，將少數的原住民視為「珍奇異獸」般，並且附上分布圖。但是比起靜態的課文內容及圖片，以漢人主觀立場及文化思維為主的社會大眾對原住民的認知傾向之影響性更是不容小覷，包括家中長輩、學校老師、同儕之間與大眾媒體等，皆在長期醞釀與助長一股污名化原住民的風氣，即使是原住民，也已經被這股風氣所影響。

<sup>44</sup> 課文內容未直接點名「山胞」，卻用「山區居民」的字眼來影射原住民為山地社區的問題。

<sup>45</sup> 1993年1月國立編譯館改編出版的國中地理課本第二冊以講述「本國地理」為主，而當時的「本國地理」仍以中國大陸為主區分成六大地區（東北、塞北、西部、北部、中部、南部），臺灣位居南部，便被納入「南部地區」當中。

## (二) 媒體：社會價值觀之縮影寫照

大眾媒體分為電子媒體與平面媒體，就歷史資料的搜尋難易度與完整性而言，本文選擇以平面媒體當中的報紙（聯合報）為例作說明，並且此章節之重點並非在於媒體報導之間的比較，而在於呈現當代台灣社會大眾對於原住民的認知傾向與媒體所建構的原住民形象。

根據王嵩音（1996：65）調查的結果發現，在民國 70 年代以前，有關原住民行政的報導居多，其次為文化報導、原住民問題。在 70 年代時，報紙出現原住民的主題則以原住民問題居多，其次為原住民行政、社會運動、文化、都市原住民。至於 70 年代之後，最常出現的主題類別則分別為原住民行政、原住民問題、文化、社會運動、人物介紹。因此，報導量最多的三個為「原住民行政」、「原住民問題」、「文化」。時至今日，平面媒體在報導原住民族相關報導，仍不脫上述之範疇（蘇雅蓉，2005）。實際以「原住民／山地人／山胞」為關鍵字搜尋查找聯合知識庫－聯合報系知識庫從 1951 年<sup>46</sup>到 2009 年的相關新聞共 61456 筆，概略瀏覽其標題之後發現與王嵩音調查結果幾乎符合<sup>47</sup>。綜合原住民相關報導可以發現，行政方面的報導除了政治人物及候選人相關新聞以外，絕大多數與「改善、關懷原住民生活、經濟、醫療與教育狀況」以及「尊重原住民主權」等主題相關；文化方面則多數與「傳統」「舞蹈」「慶典」「文物展覽」等主題相關；問題方面則多數與「行為偏差」「家庭不健全」「酗酒」「濫墾山坡地，濫伐原始林」等主題相關。

我無法確知是社會大眾影響媒體，還是媒體報導影響社會大眾，但是媒體可以形塑人們對事物的認知框架，也是社會大眾價值觀的風向球。社會大眾看待原住民的角度是由上往下或是特殊的視線，從媒體報導的內容及方式都可以窺探一二。舉幾個很簡單的實例，我的家人對於原住民仍舊處於「酗酒」「男女關係混亂」「行為偏差」的認知傾向，每當提到原住民，話題最終導向「因為是原住民所以可想而知」的結論；我的朋友其家庭曾因家人與原住民締結過失敗的婚姻，而現在提起那段往事都會以「早就說對方是原住民不可靠了，以後找對象不會再找原住民了」為最終結論；和朋友出遊，興致一來大伙偶爾小酌幾杯時，只要原住民的朋友在場，肯定少不了這句「原住民都嘛很會喝」的簡短評語來祝興……還有更多實例，不勝枚舉。在這些實例當中，不管有否產生嚴重傷害，都會從「個人行為」被歸因為「族群血統使然」。

<sup>46</sup> 聯合知識庫 <http://udndata.com/>。聯合報於 1951 年創刊。

<sup>47</sup> 概略依據王嵩音之分類方式（原住民行政、社會運動、文化、都市原住民、人物介紹）瀏覽報導標題，發現「原住民行政」、「原住民問題」、「文化」此三類之報導量最多（不過實際上確實難以依據王嵩音之分類項目作分類，有些報導內容同時橫跨兩種類別，有些報導內容則難以將其歸類，然而本文重點不在於分類基準之上，故在此特別強調為「概略瀏覽」之後的結果）。



在這樣的成長背景之下不可能不受影響，只是我企圖脫離以「族群血統使然」為出發點去看待原住民，而是選擇使用一種帶有善意的、關懷的「正向指標」去評判，例如「不是全部的原住民都這樣」、「也有父母社經地位高、家庭健全、不喝酒、不吃檳榔的原住民」、「說中文完全沒有腔調」、「家庭經濟狀況很好」……等。然而，直到進入研究所之後我才意識到，我以為是善意接納的正向指標竟諷刺的原來是負面指標的一體兩面，殊不知所謂的正向指標也是以漢人為出發點的主觀立場與文化思維——只要說中文沒有腔調、不喝酒不吃檳榔，就不是「一般」的原住民；只要父母社經地位高，就不會出現「偏差行為」——負面指標是直接的想要排除異己，我所謂的「正向指標」卻是帶有影射「漢化程度高低」之意涵，將「原住民」視為低階族群，企圖將已嘗試漢化者依等級（學歷高低、腔調之有無、家庭狀況等）分類之後安插進入漢人的隊伍當中。簡而言之就是要求別人向自己靠攏，而自己卻只停留在原地不動。

意識到長久以來沉浸在以漢人為中心的價值觀與認知角度而在無意識之間對原住民投以歧異眼光、甚至成為壓迫者，內心感到不安與惶恐——不安於如此無意識的壓迫狀態是否曾造成傷害；惶恐於該如何有意識的使自己不成為壓迫者。在不安與惶恐尚未獲得解脫之前，我選擇試著接近原住民的價值觀與認知角度，嘗試在接近的途中找尋使不安與惶恐能夠解脫的方法，只是另外一個困擾我的難題在此時又出現——「研究」與「生活」之間的場景與角色切換。

### 三、研究生的身份

不是爲了愛唸書所以跑來讀研究所(雖然沒有人規定讀研究所一定要讀很多書);不是爲了躲避成爲社會新鮮人、避免找不到工作的尷尬才跑來讀研究所,因爲已經踏出社會也正式工作過(雖然沒有人規定找不到工作一定要覺得很尷尬或抬不起頭),只是如上述般被誤認的情況都不及被套上「研究生」的光環令我覺得厭煩(事實上我的確是一名研究生=研究所的學生)。

一開始「研究生」的「光環」好閃亮,尤其阿爸特別喜歡讓別人看見它的閃光。不過,當這個「光環」閃到第三年時,光線開始變得有些暗淡,可能因爲光線變暗,讓「光環」看起來有些老舊,不過反倒吸引了更多人向我探問:「論文」近來是否無恙;相對的,老舊的光線也反常的吸來不少嘲諷的眼神。當關心與嘲諷夾雜著向我襲來時,我真想一把扔掉這個「光環」大喊「不玩了」,只是我執拗的不想被打敗(被自己、被「論文」、被社會)或永遠捨棄光環,所以我學著假裝無視那些來自身外的注視與身內的壓力。

這四年來很多時候我學會在適當時機把「光環」打開與關掉:和朋友談天時,如果不關掉「光環」,則朋友會開始對著濤濤不絕的我露出充滿疑問的眼神;和家人一起看新聞時,如果不關掉「光環」,則家人會開始對著我對新聞播報內容的批判說出:「你是讀書讀瘋了嗎»;和男朋友聊天時,如果「光環」繼續開著的話,則男朋友會開始告訴我:「你必須考量現實面,不能光有理想,理想沒有辦法餵飽人的»;和以前的同事碰面時,不管「光環」是關或開,他們都會說:「你的『論文』題目是什麼?日文一定變的很厲害吧?」漸漸的,開與關之間的衡量與選擇已經愈來愈清楚了。只是很多時候我還是想說:研究生是人,是普通人,沒有發神經,會犯錯很正常,也不是什麼模範,更不是對社會已經有所貢獻的研究人員,研究生不過是還在學習的學生而已,而且我的系所不是在研究日語或文法的。

面對有些場合,其實仍然還是分不清楚到底該把「光環」開著?還是把「光環」關掉?特別是和「研究」劃上關係時。換句話說,「研究」與「生活」的場景與角色的切換基準是什麼?

### (一) 是「研究」？還是關係的建立與維繫？

比方說，如果「研究」只是找了一個／群人、作完訪談或者寫完問卷、然後完成「論文」發表，之後和那些人再也沒有關係的話，這個過程除了「論文」寫作者得到了一些啓發或是心得或是人生體驗甚至是文憑之外，那被訪問者究竟得到了什麼？得到了「論文」寫作者的感謝？得到了「論文」寫作者的幫助？因為「論文」被發表而被訪問者的生活或想法有了改變？或者，「論文」寫作者只是被訪問者人生當中的過客般，除了記憶，什麼也沒有留下，那麼，這篇「論文」或寫「論文」的過程，究竟是什麼？意義何在？上述想法是我認知「真的要寫『論文』才能畢業」時一直存在腦海的問題。然而這樣的想法，與質性研究和量化研究之研究方法有所差異或是所謂的研究倫理並沒有絕對的關聯性存在。

重回校園以前就曾思考：現代社會為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如此薄弱？是社會進步的表徵？還是所謂「現代」正是這麼一回事？我沒有答案。重回校園之後卻讓我找到了部份答案，因為參加活動計劃時，我看到了人與人之間濃厚的關係仍舊存在。此外亦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原來可以有很多種觀看的角度，只是那些觀看的多種角度，是否能夠呈現在「論文」寫作方面，我其實懷有疑問。一來對我自己的呈現能力抱著懷疑的心態，二來對於「閱讀者」的解讀能力抱著很多疑慮。懷疑自己在寫作時，無法適切的表達出各種觀看角度（不論是存在於我個人內部的多種觀看角度，或者是他人告知我的多種觀看角度），也對「閱讀者」的接收能力抱持一種「明知擔心多餘卻仍就擔心<sup>48</sup>」的心情。對於第二種疑慮僅管再如何思考終究必須釋懷才得以開始寫作，但是對於第一種疑慮，在寫作時卻無法不小心翼翼、反覆思考。

「論文」寫作非常個人、自我又主觀，不過並非單憑作者一人便能完成，其中又有許多人的貢獻與演繹，甚至是情緒，都無法全然轉化為文字留存下來。因此在「論文」構思、採訪與寫作之間，我一直思考著自己和「研究」之間的距離到底該如何拿捏？或者要用什麼樣的角色在何時進入「研究」？就個人立場而言，我不認為是在進行「研究」，只覺得自己和被訪問者、協助者在建立關係並進行對話與交流（並希望關係的建立與對話交流是持續的狀態）；然而對於被訪問者、協助者而言，卻表示覺得我就是再進行一項「研究」。或許是我個人的執拗，堅持自己並非在進行一項「研究」，然而，若真要說明白的話，我認為關係的建立與對話交流是凌駕於所謂的「學術研究」之上。換言之，「研究」可以中止，但關係的建立與對話交流我卻想持續維繫<sup>49</sup>。不過，換另一個角度來說，或

<sup>48</sup> 閱讀者有其閱讀文章的詮釋自由，作者無法亦無權干涉（類似羅蘭巴特於 1968 年時說過的「作者已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之意）。

<sup>49</sup> 原本設定的本文協助者有兩人，礙於此點堅持（不想加諸「論文」「研究」在一段沒有把握能

許我真是在進行一項「研究」，一項以「傾聽與自省為主軸的研究」。

只是一旦牽涉到他人（被訪問者、協助者），必須思考的便不僅只是我與他人（被訪問者、協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使用他人（被訪問者、協助者）話語」的態度也不得不重視。

---

否長久維繫的關係之上)，最後僅剩一人。

## (二) 是學術？還是利用？

某原住民網路論壇成立初期，創設者曾經問我為何想要加入論壇。對方說「如果只是爲了畢業或爲了論文而加入論壇，畢業之後對於原住民議題就不再關心的人，論壇可能不歡迎這樣的人加入」類似此義的話。在場共有四人，除了創設者之外，包括我在內的其餘三人都不是原住民，也就是漢人。另外兩位的感受我是無法代言，我個人是有些許錯愕，畢竟對方的問法讓我覺得有種「被懷疑」的感覺；然而換個角度想，漢人想要加入原住民社群的動機原因會被質疑也不是沒有由來<sup>50</sup>，只是我當下的疑問是：關注原住民議題和以原住民議題爲研究主題的差別爲何？是「單純關心」與「假藉關心實則利用」的差別嗎？或者是以時間的長短來衡量是關懷或是利用？什麼又是「利用」？什麼才叫「關心」？

另外，和協助者 M 一同討論的過程當中，某次 M 邀約我一同前往 M 的朋友家同樂。其源由是因爲在討論中 M 向我提及她與部落長大的原住民不同的地方時，總會提到她認識的兩位友人（其中一位在很久以前經由 M 介紹早已認識，另一位則未曾見過）。（其中一位在很久以前經由 M 介紹早已認識，另一位則未曾見過）。某天正好 M 與其朋友有約，便邀我一同前往。一番小酌之後，他們關心起我的研究方向，而首次見面的友人則問起我對於家鄉人口不斷外流的想法，並且接續的問我畢業後是否考慮將來回家鄉就業等等相關問題。過程都還算愉快只是談話中不知爲何對方突然冒出「對於別人的欺騙，我是個敏感的人…」這句似乎不完整的話。我想等對方把話說完，可是對方持續停頓遲遲未再開口，並且遭另一位友人制止是否酒喝太多在亂說話，所以我並不知道那句話的含意到底是什麼。或許是對方真的喝多了，也或許是因爲對方覺得我可能在說謊（想返鄉就業或是對原住民的看法），只是在這裡提出這句話顯得非常斷章取義，但是我的用意並非在質疑對方說出這句話的用意，加上因爲前後的談話之間毫無關聯性，所以我也不想斷章取義的解釋對方有懷疑我的可能。在此提出這句話的重點在於這句話令我連想起上一段提到的創設者向我問起的問題，然後我再度思考起何謂「利用」何謂「關心」的問題。

最終我得出一個結果，就是不將「論文」放置在剛建立起關係的人事物之上。這樣的作法勢必遭受到的最大質疑便是：關係建立已久的人事物便可安心的放置於「論文」之內嗎？另外，設定關係建立已久的人事物爲協助者是否將影響本文結果的客觀性與信效度？但我必須澄清的是，並非關係建立已久的人事物便可「安心的利用」在「論文」當中，而是「關係持續維繫」才是能夠安心利用的最大原因，「關係」不會因爲「論文」「研究」而產生中斷或阻礙，這是我寫作開始

<sup>50</sup> 孫大川（1996）：〈碾米廠的門檻〉。見孫大川主編（2003）：《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散文卷（上）》，台北：印刻。81-83。

之前就已決定的最基本條件（就寫作的立場來說，不管動機是善意還是惡意都將被歸納於「利用」的話，那麼「利用」本身就已不再值得去執著關注了）。此外，關於信效度問題的回覆是「每個人有其不同的、特有的生長背景之下的經驗與解釋<sup>51</sup>」，依據其生長背景的不同所講述的經驗與講述方式是本文呈現的焦點，並且企圖跳脫個人被冠以某族群之名而化約其特殊性的框架。

---

<sup>51</sup> 姚美華、胡幼慧（2008）：〈一些質性方法上的思考：信度與效度？如何抽樣？如何收集資料、登錄與分析〉。見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118。

● 她的故事——我們的對話：第一次寫別人，其實很不安

和 M 認識很久了。嚴格說起來，國小一年級就是同班同學了，但是那個時候彼此沒有印象；到了國小三年級，我開始對她有印象（後來問 M，M 說那時候對我仍沒有印象），偶爾下課時會一起玩遊戲；國小五年級剛開學，不知是否爲了成立資優班的緣故，大家頂著豔陽在操場上被老師們分來分去（國小升上五年級時，總會將原本的甲、乙、丙、丁四班的學生像洗牌那樣重新編班編號），而我和 M 彼此都認同的一個相識起始點，就是在那個進行分班的操場上，被編到丁班的區域等待的漫長時刻。從此，我們不時的在彼此的生命中進出，即使我先離開家鄉來到西部唸書，但是兩人仍然保持聯絡至今。

進入研究所參與「山」活動計劃之後，在部落和居民的接觸互動令我想起自己從來沒有和 M 進行過類似的互動，例如聊些既非關「傳統」亦非關「天賦（歌舞、體力、酒量等）」的「原住民」相關話題。是否因爲 M 的行爲舉止與家庭背景和我差異不大，不像印象中的原住民那般與我「不同」，所以我不感到「好奇」？還是純粹這將近二十年來沒有任何引發談話的契機？於是徵求 M 的同意之後，我便決定以「論文」爲引發談話的契機，設定 M 爲本文協助者，一同進行既非關「傳統」亦非關「天賦（歌舞、體力、酒量等）」的「原住民」相關話題的「對話」與「訪談」。

爲何要分爲「對話」與「訪談」？就形式而言，過程中我和 M 的對談分成兩種：一種是藉由回溯我們的過去（共同記憶與個人記憶）所延伸的「對話」——無事先設定問題，也就是依著「回顧過去」的主題如聊天般進行（爲了「回顧過去」，我們一起看了彼此的照片冊，一起製作了我們的大事年表，從照片和大事年表當中，我們都想起了很多人事物，我也從中產生了一些疑問）。地點不拘，但以茶飲店爲主，也曾在室外體育館繞著操場或延著舊鐵道邊散步邊進行；時間大部份在晚上，以配合 M 下班時間爲主；次數方面，依照我個人的記錄多寡而言，長時間（1 個小時以上）的對談大約進行了 10~15 次，短時間（1 個小時以內）的對談大約進行了 5~10 次；過程當中除了無事先預設問題，爲了顧及自己與 M 的對談心境（覺得「錄音」在對談當中顯的太過不自然而影響對談的進行——事實證明在「訪談」時「錄音」的確影響了對談的進行），也不做筆記亦不錄音，都是對談結束之後回到家憑著記憶用電腦記錄下我印象中的對話及我的感受，也因此衍生出另一種形式的對談：唯一一次的「訪談」。

（獲得 M 的同意）在錄音及錄影的影響下，「訪談」的氣氛比「對談」來得正式又嚴謹，也或許是我預先準備的問題清單讓對談內容變得僵硬。問題清單都是從我的關於「對話」的記錄當中整理歸納而來，爲了對照記錄是否與 M 所說

之意有所差距或誤解，等於是在進行一種確認，以降低我誤解 M 所言之可能性；地點在某間茶飲店的露天 2 樓座位，訪談過程中被店員、攝影機沒電與其他客人的吵雜聲造成訪談的幾次中斷；訪談時間總計約 2 小時左右（依據錄音檔加總時間）。過程中我的角色既是 M 的朋友，同時也是從旁觀察者，加入對談也觀察對談。

先從家庭背景開始說起。M 的父親是部落長大的原住民，母親是住在都市的漢人（書香世家），據 M 的說法，這樣的組合在那個年代是非常罕有的，M 說 50、60 年前原漢通婚的模式都是男方是漢人，女方是原住民的模式居多，而且男方的漢人又以外省人老兵最多。關於早期外省老兵和原住民女性的通婚事例，其實是我進入研究所之後才開始有此認知，以前在家鄉，還有到西部唸書時都沒有特別注意到有這麼「特別」的婚姻存在，不過男方是原住民，女性是漢人的組合就真的很少見過，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只見過兩對，M 的父母是其中一對<sup>52</sup>。促成如此不同的婚姻勢必有其原因或根本沒有什麼原因，然而因非本文重點，故不作深入探討。父母雖然皆自幼失去雙親，但憑著自己努力獲得良好學歷及工作，並在結婚之後選擇遷居都市，理由是爲了給第二代良好的教育環境，儘管喜歡部落生活的父親因爲工作必須每日往來於部落與住家之間仍不以爲苦，只期待老了之後能夠重返部落生活。父母逆境成長的經驗相對的提高了父母對於生活環境富足的 M 的期望與要求，特別是母親，M 說自幼便覺得自己總是達不到母親的要求、得不到母親的愛，進而對自己產生自卑與喪失信心，直到近年來 M 回到家鄉工作，母親跟 M 說多年來都有看見 M 的努力，只是都放在心裡沒有對 M 說，這才讓 M 逐漸開始解開與母親之間的「結」。此外，父母雙方皆信仰基督教，自然而然的 M 自幼便浸濡在聖經與詩歌之中，只是這樣的自然而然卻使 M 曾經非常抗拒上教會作禮拜，也找不到所謂的「信仰」，首次離開家鄉北上生活讀書時，有一段時間 M 很少主動前去教會作禮拜，直到兩三年前結束在北部的的工作回到家鄉之後，因緣際會之下換了教會，才開啓她重新看待所謂「信仰」的視角。

許多延伸而出的話題當中，關於原住民祖靈信仰與基督教信仰的談話讓我印象深刻。那是第一次正式和 M 提到本文的寫作背景，我簡單的和 M 分享了參與「山」活動計劃時在部落的交流經驗，包括參加教會的禮拜與慶典活動，之後 M 便和我提到她對祖靈信仰與基督教信仰之間的想法。M 說教會界有很多派別及不同的看法，就 M 目前接觸的派別教義而言，認爲天地之間只有一位上帝，不認爲還有其他的神存在。有些教會覺得沒有衝突，覺得祖靈信仰是傳統，是很久以前的祖先就開始這麼做的，可是對 M 來說，既然不衝突的話，爲什麼要拜它？因爲「拜」只會對上帝，如果對上帝以外的對象進行「拜」和某些「儀式」的話就表示也將上帝之外的對象當做是神了，所以才會進行膜拜。由此可知 M 目前

<sup>52</sup> 另一對則是蘭嶼島上著名民宿的老闆和老闆娘，詳見「女人魚民宿」網頁 <http://www.mulita.com.tw/>。



在信仰上的認知是覺得祖靈信仰與基督教信仰的互相衝突的。M 舉例阿美族的豐年祭和布農族的打耳祭，M 認為唱歌跳舞沒有關係，但是在歌舞之前還會進行一些撒酒與敬拜祖靈的儀式，而且祭典之後還會因為飲酒過量而發生脫序的行為。我與 M 確認過後得知 M 是兩三年前更換教會之後才有了上述的想法，這樣的信仰確認對 M 來說，無疑是人生的轉變，但是我認為父母在教育上長年來以漢人文化為中心亦是 M 有此轉變的重要背景。M 說自幼便很少隨父親回去部落，父親亦沒有要求 M 要學習族語及部落文化，甚至是部落的重大慶典儀式也鮮少參與，雖然曾經和父親回部落教會作禮拜，但因為全程皆以族語講道，M 必需仰賴父親的翻譯才能夠聽懂，使得 M 覺得很麻煩，便開始拒絕父親的邀約（回部落教會作禮拜）。

M 同時俱備原漢血統，自幼便認知自己的原住民身份，但是父親不要求學習族語與文化的作法，讓 M 在我眼中看來就像是與我長相不同的漢人而已，在我的記憶中 M 上大學之後，因為社團的緣故結交了很多原住民朋友，我便問 M 大學時期是什麼契機讓 M 想去參加原住民社團（這問題我從未問過 M，因為以前覺得 M 參加原住民社團很理所當然，所以沒有引發任何提問的動機）。M 的回答讓我有些訝異。M 說，從出生開始就住在都市，跟父親回到部落時會感到自卑，覺得自己不會說族語也不懂部落文化，因此除了親戚的小孩之外，鮮少認識原住民朋友，也因為這個原因，M 剛上大學時便決定要認識很多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朋友，想知道不同族群的原住民是否也和自己相似，於是便加入以原住民為對象招收的社團。

加入社團之後，M 學習了一些原住民各族群的文化，也認識很多族群的原住民朋友。但是初期剛加入時，M 對自己原漢混血的身份感到質疑，因為面對漢人時因著外貌她立即被視為原住民，但面對社團當中多數來自部落的原住青年時，她卻被視為漢人，因為她不懂所謂的部落故事及部落生活，時常被部落青年說「你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也不關心」（但 M 特別強調他們說此話時的口吻並無惡意）。我問 M，每當被那麼說時，內心都作何感想或怎麼回應？M 說，就會很老實的回答自己真的不知道所以才加入社團的。我又問 M 說，那後來真的有被激發學習的熱情嗎？M 笑著跟我說，其實真的沒有，她從沒有認真的想過要學習原住民的文化，她加入社團單純就只是想要拓展自己的原住民交友圈而已，因為從小在市區長大，沒有什麼原住民朋友。

由於父親不會灌輸很多原住民的傳統文化方面的想法，M 認為父親把她當成「一般的小孩子」一樣教育（在此我認為「一般的小孩子」有漢人小孩之影射含意，意指在漢人文化為主的社會當中，和大家一樣就是所謂的「一般」），不會講族語，父親也不會逼著說一定要學，相對的 M 也不曉得以前的傳統知識，對於原住民傳統文化方面的了解一直很模糊。「原住民」對 M 來說就是代表 M 的

「血緣」，讓她的外表長得像「原住民」，可是 M 一直質疑自己私底下到底算不算是原住民？

M 覺得自己原住民的（認同）比例沒有很多，但不知道他人是如何看待，也因為不是在部落長大，對於部落傳統的「同心協力」精神沒有什麼想法亦沒有概念，只有逢年過節會回部落向親戚拜年，其他時間都是居住在市區，所以「原住民」的身份對 M 而言僅是代表血液中的一部份，並讓她的長相像所謂的「原住民」而已。

M 也認為原住民文化復興之事交給其他有能力的原住民去做就可以了，因為她根本不懂。M 曾經想過假如自己不是原住民的話，求學過程或遇到一些事情時是否會比較順利。在 M 的想像中，如果自己不是原住民也許不會過得更順利，只是畢竟在台灣，原住民是少數的族群，而且 M 覺得自己的長相又非常的明顯（是原住民），所以逢人便被問「你是原住民嗎」的時候，總覺得別人會從「原住民」去連想到不好的事情，就算對方根本沒有惡意，但是自己就是會覺得對方肯定把聽過的不好事例（原住民）與自己劃上等號。M 認為會這麼想跟對自己沒有自信也有關係，但是仍然會想像自己假如不是原住民的話，有些事情會不會就不會發生了。

另外 M 也分享了對（M 經歷過的）早期原住民加分制度的看法，M 不否認覺得政府是出於善意，但是質疑加分制度並沒有考量到原住民每個人也是有差異的存在，對有些原住民來說是一種幫助，但對某些原住民而言，尤其是在部落或深山長大的小孩來說，進入市區的好學校好班級卻需要很長的適應期，或許根本無法適應，反而帶來極大的壓力，加上社會上某些人對原住民又存有刻板印象，間接造成原住民因此產生自卑感，一種無形的自卑，因為起跑點與別人不同，原住民就會開始對自己產生懷疑，並給自己戴上「別人是否在嘲笑我是原住民」的帽子。M 說這就是社會長期以來帶給原住民的壓力。

同樣的原住民為何會酗酒也是相同的道理，在部落有很多有能力有才華的原住民從部落進到都市時，因為無法適應都市的遊戲規則（在此我認為可解讀為以漢人為主所訂定的），以至於難以在都市發揮自身才能，只能抑鬱回到部落藉由酒精來麻痺自己。講到這裡，M 也打趣的說道，為何原住民愛喝小米酒？因為小米酒比較便宜的關係。此外 M 覺得目前的台灣社會對於原住民仍然存有刻板印象，就 M 的認知，原住民有很多非常有才能的人，但是新聞媒體似乎對這一塊好像不太感興趣的樣子，即使原住民有很多人具有博士學歷或在各行各業有所發展，但是現代的新聞主流好像不會去加以報導原住民那一方面的表現，M 說她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現在執政掌權者以漢人為多的緣故，M 說：

「哪一方的人比較多力量當然就會比較大，不管那些人是好的或不好的，可是力量就是會大，這也就是爲什麼有時候我爸常會講：「其實原住民才是台灣真正的主人」，然後我就會回他：「然後那又怎麼樣呢！你們又沒有力量」，他常都會說都是外省人本省人把我們原住民趕到山上，我就說然後呢，因爲他就一直說原住民才是真正的主人，我就說那你的力量要拿出來呀，對啊，你只是在那邊講說你們是台灣的主人，然後呢？沒有力量的主人，誰會理你們…（略）…可是又很奇怪的是，只要有什麼觀光活動或是什麼，又會搬出原住民的歌舞來，明明就是利用嘛…（略）…像有什麼國際活動，又把原住民拿出來弄一弄，然後呢？」

此段可看出 M 對於某些原住民（例如 M 的父親）大聲急呼原住民是台灣真正的主人與原住民在台灣的微小力量之間感到權力的不對等，對於新聞媒體鮮少關注原住民的才能與原住民傳統文化頻繁被消費被利用之間的落差感到不平卻又無可奈何。

除了上述話題之外，過程當中我們彼此也互相分享了身爲東部縣市的小孩前往西部及北部大都市唸書生活的經驗。相對於北部或是西部，東部被歸爲偏遠地區，當東部的小孩出現在西部或北部的學校班級當中，總會引起一陣小騷動，好似我們是珍奇異獸般，不過被「另眼相看」就算了，常被記錯我們出身的縣市名稱及地理位置這一點卻教我們覺得有「不被重視」的感覺，彷彿我們對他們來說就只是稀奇而已，至於細節方面的事情根本沒有興趣想要了解，只是把一貫對我們的刻板印象強加在我們身上而已（例如東部來的人都是原住民），而 M 又有原住民的長相及身份，其醒目程度更加使她脫離不了負面的原住民刻板印象。爲了擺脫刻板印象，M 覺得要儘量接收最新資訊，大家在講什麼、流行什麼都要有個了解，並且認爲「網路」能夠讓城鄉差距消失。

此外從談話當中，我發現 M 的談話圍繞著一個重點：對於信仰不再迷惘，也找到屬於自己的信仰方式，亦從信仰當中找回自信並接受自己。2004 年自大學畢業之後返回家鄉工作的 M，對於生活與自己還有許多期待與想做的事，便在 2005 年末再度北上，完成了許多一直存在她幻想之中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壞的），直至 2007 年 2 月才心滿意足的回到家鄉。回來以後，在母親讓她自由選擇教會的允許之下，她選擇以韓國派系教會來代替從小到大作禮拜的英國派系教會，並且於 2009 年 1 月成爲該教會同工——從 2007 年到新教會開始至今，M 認爲這期間是她人生轉變最大的階段，雖然 2002 年至 2003 年期間去了韓國交換留學一年對她而言是非常特別的人生體驗，但是卻稱不上帶來轉變。

以上是整理之後的我們的對話內容，也是我眼中的她的故事。

還有很多在「我們的對話」之間所浮現的「她的故事」並沒有寫進這個章節裡，換句話說，這個章節並非依照對話內容如實呈現的，許多依據「我的判斷」所省略的部份，讀者在此並無法看到。

我沿著 M 的敘說在此安排了一則「她的故事」，倘若是在別處，我則會安排另一則「她的故事」。其中唯一的一段逐字稿，則是我認為那部份是 M 極欲透過本文傳達之處，故依據 M 當時所言，一字一句的再現，希望能藉由轉化的文字形式來傳達 M 的聲音。

● 然後

藉由 M 的敘說經驗，我開始試著整理自己的成長之路。

我發現在父母雙方皆是漢人（自離島移居台灣本島的漢人）的環境之下，家庭內部亦理所當然以漢人文化的承傳為主，特別是父權象徵的漢人男性（阿公和阿爸）帶給我的影響甚鉅（但此話不表示漢人女性－阿嬤和阿母對我的影響微弱），然而成長過程中，我卻不斷與父權象徵的漢人男性（以阿爸為主）產生爭執與對抗，看在保守的阿爸眼裡，自是拿我與柔順溫和的阿母與乖巧聽話的大哥、大姐、小弟比較，認為我極度頑劣與不懂事，但是所謂的爭執與對抗的由來只是因為我有話想說、我說出來的話與阿爸想聽的不一樣而已。一直到我前往西部唸書、脾氣較為收斂、講話方式也比較不像以前那麼衝動之後，阿爸才開始覺得原來我只是說出想說的話和他進行溝通而已。

不過對 M 來說，從小就必須面對兩種文化與價值觀，也必須接受兩種文化與價值觀之間的衝擊，雖然對她而言，家庭教育以母親的漢人文化與價值觀為主（父親也習得相當程度的漢人文化與價值觀，然而從 M 的言談之中可以感覺到，母親對 M 而言似乎較父親來得影響大），使得兩文化與價值觀之間的衝擊是微乎其微，但是仍然引發 M 曾經思考「假如不是原住民（而是漢人）」的假設性問題。而在信仰方面，對於信仰意義的重新構築讓 M 找到人生目前的平衡點，不僅對自己不再如以往缺乏自信，在工作上也找到盡情發揮自我能力的空間，加上與母親的多次深談開始讓她逐漸解開自卑的束縛。

對我和 M 來說，我們的對談是一種分享的過程。M 曾在過程中跟我提道，由於我／「論文」的關係，她想起了很多早已忘記的事情，也重新翻閱了以前的日記和照片（她的和我的），並且覺得與我共同渡過的時間帶給她很多快樂與工作壓力的釋放。聽到 M 這麼說，我也有種如釋重負的開心，因為在對談之前我一度思考很多，例如「論文」一事與「研究生」身份是否會帶給 M 生活上與對談時的壓力，並且過程中我一度以為 M 說自己不了解原住民事物而想介紹友人給我認識的原因是因為面對「論文」一事與「研究生」身份已對 M 產生了負面影響（例如認為自己對「論文」幫不上忙），但最後一次的訪談卻證明了並非我所想像的那般，M 對於自己不熟悉原住民事物的態度是相當的坦然，雖然面對部落青年時被當成漢人令她覺得有些格格不入，但她仍不以為意，此部份與家庭教育中父親所扮演的角色有著密切關係，而自小社會（漢人）與母親帶給她的自卑感也逐漸在她為信仰找到新意時開始有所轉化。

藉由自我對話與和他人對話的方式寫出我人生的一小部份與我眼中的她的

故事，我不知道能否改變社會，也沒有辦法經由計算和測量得知從小社會建構予我的原住民認知究竟改變多少，我只知道，以後的我或者其他人可以看見我所記錄下來的軌跡，那個我企圖藉由本文想要和漢人主觀立場與文化思維所建構出來的原住民認知作對抗的軌跡。

如果沒有開始，就沒有結束。我提筆開始寫了，終將放下筆桿。只是放下筆桿前，我猶豫了，我猶豫此時是否可以放下筆桿？因為我擔心自己是否已道盡想說的話了…因為我擔心寫得是否合乎讀者所期望…。

無論如何，我都得畫上最後的句點。

● 寫在「然後」之後

我是一位麵包店的學徒，花了快四年的時間在學做糕點。雖然比別人多花了時間學工夫，但其實技巧還是非常生疏。

今天我做的這個千層派<sup>53</sup>，不知道你吃起來覺得如何？

我覺得我做的這個派，銷路可能不會太好，因為和麵粉時，忘記秤各種材粉的重量，有點隨心所欲的想加多少就加多少，導致派餅本身可能有些地方太硬，有些地方太軟，而塗奶油時，因為力道不均，有些地方奶油塗得較多，有些地方奶油塗得太少，甚至有些地方沒有塗上奶油，導致吃起來的口感可能有些地方會太膩，有些地方卻太乾。總之，整個派就是呈現一個不均勻、不適口的狀態。

不知道老師傅們覺得如何？我想他們一定會說：這個派不夠好，不能端出去賣，會打壞我們的口碑與招牌。

但我帶著些微的不肯定，小心翼翼端出這個派，內心相信一定會有人喜歡這種口感的千層派的，縱使那個人不知道現在在哪裡。

---

<sup>53</sup> 「千層派」的概念來自於和同學 J 及阿川的三人言談之間。

## 後 記

### 之一

6月22日，學位考試的前兩天，電視新聞報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公佈98學年度下學期的系所評鑑結果，其中東海大學日文系大學部與研究所的評鑑結果被列為「待觀察」，意指評鑑委員認為本系所的教學方針與課程安排等等不符合「日本語文學系」之系所名稱。

6月24日學位考試當天，指導老師阿川、審查委員阿花老師和小雪老師各別給了我很大的鼓勵與受用的意見，現場氣氛變得非常和緩，也讓我備感溫暖。息間阿花老師還提到，他來到東海日研所感覺這裡氛圍很特別、很有趣，也給系上一些讚美。但一旁的小雪老師立即告知阿花老師說，系上前兩天才剛被評為「待觀察」，最糟糕的情況是系所可能會被迫倒閉吧。阿花老師一聽，有點尷尬的笑說，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就太可惜了…。

是啊，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就真的、真的、真的太可惜了…。

作為一位學生，很難向體制作出抵抗，往往只能在體制的壓迫之下低調行事，如同我在這裡說出「評鑑委員」、「評鑑標準」與台灣的教育機制有很大的問題一樣。然而縱使低調，我仍必須把握這樣微乎其微「被看見」的可能。因為我不想被邊緣化或被直接消滅，不想默不作聲的被放入「不被認同＝異類＝邊緣化或直接消滅」的模式當中，儘管無法造成立即性的改變，儘管最終會落入被消滅的境地，然而我還是想做些什麼（就算只是垂死掙扎也好）。

如果評鑑的機制在於替未來的學生把關各校系的教學品質的話，那麼，那些在學學生的意見又被放置到何處了？讓沒有置身各校系學習環境體驗的評鑑委員僅憑書面報告與短暫視察來替未來的學生把關，這是否太過本末倒置與片面武斷？何不以在學學生的經驗與意見為主要評鑑的考量輔以評鑑委員意見這樣的形式來進行呢？或說直接廢除出現的很莫名其妙的評鑑機制，讓各系校自行在市場機制之下續存或淘汰的方式亦遠比現在的評鑑機制來得好。

總結來說，在評鑑的標準之下，台灣的「日本語文學系碩士班」就僅能繼續研究日本語文、文學或文化而已，但如此範疇未免太過狹隘。倘若改變系所名稱就能解決範疇狹隘的問題的話，那評鑑制度不過就是和各校系所在玩一個文字與權利、金錢的遊戲罷了。



## 之二

學位考試結束以來，日子莫名的向前飛逝了好一大段，但我依舊緩慢的在原地用近乎蠕動的方式旋轉著搜索適切的方向，然後在每個方向之前觀望，猶豫著要否往眼前的這個方向前進。雖不至於像之前那樣停在原地躊躇不動，但龜速的程度似乎也沒有任何進展與改變。

回想口試結束的當下，我並沒有特別開心或鬆了一口氣、有獲得解脫的感覺，反倒有一股「就這樣結束了？！真的結束了嗎？」的扼腕情緒，就像看見風箏斷了線，即將從手邊飛走那般，我覺得「論文」在遠離中，只是「論文」遠離了，我的「故事」還在持續著。大概就是「論文」與「故事」在交疊了好長一段時間之後突然不得被拆開的緣故吧，所以深沈的落寞感才會油然而升。

研究所四年來，不管是在課業上、在活動專題上（「山企劃」及「東亞企劃」）、在經濟方面、在精神方面等其他各種層面，皆受到許多各界人士的幫忙、照顧與容忍。特別是家人、好友、研究所的同學們與老師們更是四年來在我身邊不斷出現並給予支持的主要來源。

學位考試時指導老師和審查委員的意見與分享除了讓我的緊張情緒充份緩和下來之外，給老師們的首次閱讀也讓我的「故事」與「聲音」在「被看見」「被聽見」之後有了對話與交流的機會，更讓我對於「故事可否是論文」的疑問獲得了肯定的答案。而蒞臨現場給予我批評指教的老師們、同學們與學弟妹們，我也很感謝大家，因為大家的存在，才使本篇「論文」的內容大綱在學位考試的「空間」當中有了第一次公開的對話和交流。

另外，在我生命當中出現的每一個人，不管是不是過客，不管記得我與否，在此我都要感謝他們。因為與他們的相遇，才形成了現在的「我」，進而促成了這本「論文」的問世，尤其「論文」中我所提到的每一位，無論是否具體指涉，我都心存謝意。

最後，我想說的是，我真的非常熱愛這四年當中我在東海所作的每一件事與相遇的每一個人，儘管花了四年，儘管世人覺得四年太長，儘管論文難寫，儘管上個工作的薪資存款已用盡，儘管往後有學貸必須償還，儘管世人覺得這個「日本語文學系」很不正常，但我仍然會說：正因它「不正常」，所以在「研究所」這塊區域之中才有我的容身之處。這四年在東海，我真的，過得非常充實！



在此特別感謝寫作本文時一直陪伴我  
與不斷「阻礙」我的他們。

